本期导读

本刊编辑部

新文化运动以来，小说挣脱了“小知者所及”、“君子弗为”的羁绊，卓立于“中国古代文学现象的顶峰”。明清小说顶戴着“名著”、“经典”的桂冠，成为广被全球、播传最为深远的中国文学著述。可是，让古今读书人常常拍案叹喟的是，小说家们非但不认同“才子书”的美誉，反而自认笔下的无端和荒谬。**《经典的荒唐》**一文，从吴承恩睿智的荒唐说起，及至《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镜花缘》，细说着大师们的经典披戴着的荒唐。

两千两百多年前，赣榆方士徐福受命泛海东渡，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先后抵达今韩国、日本，传播华夏文明，造福当地民族。1992 年以来，张良群先后八赴日本、五赴韩国、数次赴中国冀鲁江浙徐福相关地区，觅寻有关徐福的古代石刻。至目前，东亚已发现的古代徐福石刻共 9 件。张先生对这些石刻一件件分别实地考察、零距离接触，形成了**《赣榆徐福在东亚的古代石刻》**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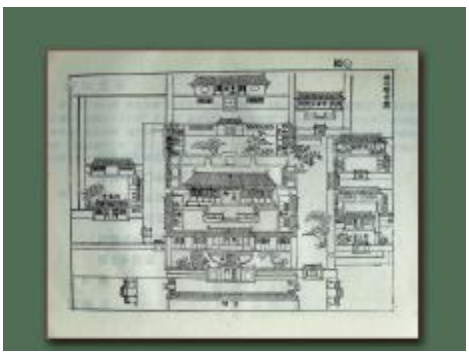
建庙祭祀，并与建学校相结合，成为我国在封建社会重视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表现。庙学就是孔庙和学校的结合，或称为学宫。学宫内，除祀立孔子神像外，还同时建有名宦祠、五贤祠、忠义祠等。名宦祠是庙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位于学宫旁，别立一祠。这些名宦有幸进入天子门墙，和诸先贤紧邻，位置特殊，目的是为了昭示后学，厉行教化。张树庄先生的**《海州文庙名宦祠》**一文，引经据典，详细考证了海州文庙名宦祠的相关情况。

祥云观，《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祥云观在巨平村南，观前二池，常出云”。栖云，栖云山也，弇榆山易名也。精舍者，“集生徒讲学之所……亦称僧、道居住或讲道说法之所”。明僧绍（？—483 年）南朝宋齐隐士、经学家。《南齐书》载，昇明年间，明僧绍弟明庆符为青州刺史。而明僧绍随其弟明庆符一起到了郁州，住弇榆山栖云精舍。李正耀先生的文章**《祥云观或是栖云精舍的遗迹》**从明僧绍入手，详细论证了祥云观与栖云精舍的关系。

治水者，历朝历代当政者之要务也。我市地处淮河流域沂沭泗河下游，是有名的“洪水走廊”。千百年来，我市人民一直与洪涝灾害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留下了众多治水碑刻。见之于文字记载和实物的碑记有 9 篇，其中明朝嘉靖二十四年（1545 年）疏浚蔷薇河碑文 3 篇见于《隆庆海州志》。张卫怀先生整理的**《连云港市治水碑》**一文，详细介绍了留存于世的治水碑刻内容及治水相关情况，为读者了解我市治水历史开启了一扇窗口。

P7 赣榆徐福祠远景

P14 古城年味浓



P17 海州学宫图

P38 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旧址纪念馆效果图

目

■ 地方文化研究

经典的荒唐 …… 李洪甫 04

赣榆徐福在东亚的古代石刻 …… 张良群 07

明清志书中的海州风俗概述

——兼议其在现代的传承与变异(下) …… 宋继奎 11

新年话年俗 …… 张名艾 13

■ 历史考证

海州文庙名宦祠 …… 张树庄 17

祥云观或是栖云精舍的遗迹 …… 李正耀 19

“众妙开山”前云台山清风顶宗教流布情况述略 … 陈贵洲 23

■ 峥嵘岁月

“我对共产党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

——追记三叔孙若溪的革命生涯(下) …… 孙苏林 27

■ 人物春秋

把骨灰撒在海师校园的人

——追记张国华老师的曲折人生 …… 张学贤 30

■ 往事追忆

彦涵在东海师范求学经历 …… 刘　阳 34

■ 史海钩沉

赣榆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 祝新华 36

录

■ 红色纪念地

八路军 115 师司令部旧址 …… 本刊编辑部 38

■ 风物览胜

连云港市治水碑(一) …… 张卫怀 39

小塔山水库的前世今生 …… 葛均坡 42

大伊山古桥寻踪 …… 吴唐基 44

■ 党史博览

中共一大研究若干热点问题简述 …… 郑国伟 46

■ 封面

江苏省最大的人工水库——石梁河水库

石梁河水库位于位于新沭河干流中游，东海县、赣榆县交界处，是以防洪、灌溉为主，兼有供水、养殖等功能的大(二)型水库，是连云港市 500 万人民的重要备用水源。水库集水面积 15365 平方千米，最大库容 5.31 亿立方米，灌溉面积 5.33 万公顷，1958 年 12 月开工建设，1962 年底竣工。

《连云港史志》编委会

顾　　问：(以姓氏笔画排列)
古龙高　江行舟　刘畅征
许燕鎏　杨春生　李洪甫
张学贤　张良群　彭　云
韩世泳

主　　任：李　东

副 主 任：张　斌　朱　瑞　赵廷旗
陆瑞萍

委　　员：(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忠新　王　滨　刘　鹏
邱仕明　何洪斌　姜龙才
郝　芳　董恕志　韩翠林

主　　编：李　东

副 主 编：张　斌　朱　瑞　赵廷旗
陆瑞萍

责任编辑：邱仕明　张伟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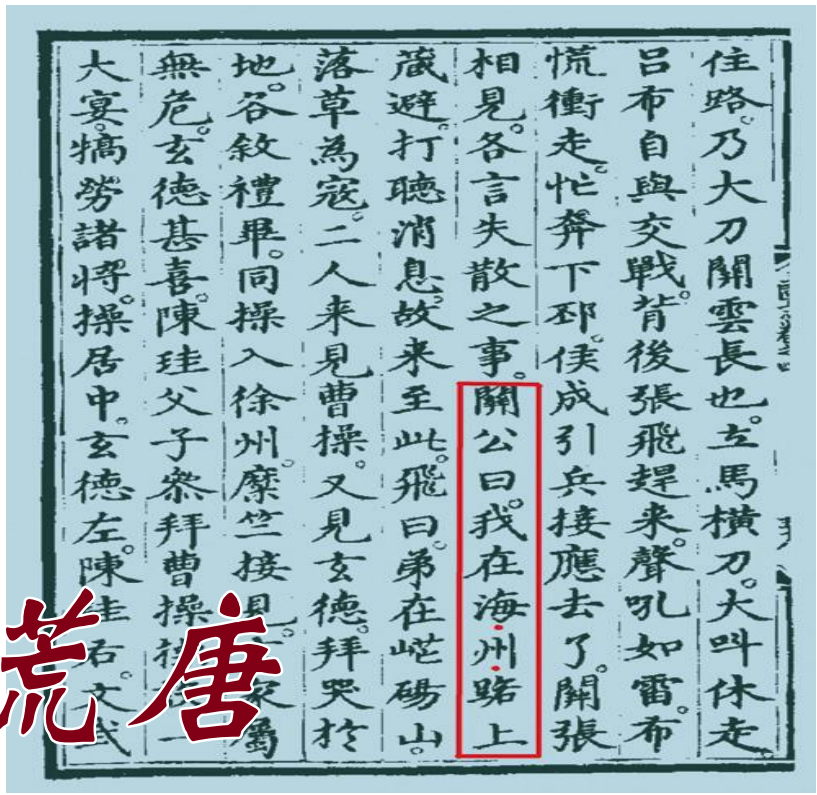
文字总校：张俊鹏

2013 年第 1 期总第 85 期
(内部资料　赠阅交流)

纵览历史借古鉴今
展现风貌追溯渊源
立足港城洞开窗口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地　　址：连云港市新浦区朝阳东路 69 号
邮　　编：222006
网　　址：www.lygsz.gov.cn
电子邮箱：Lygshitan@163.com
电　　话：(0518)85825137 85821368
印　　刷：连云港市百草园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苏新出准印 JS—G033 号

经典的荒唐


住路。乃大刀闊雲長也。玄馬橫刀。大叫休走。
呂布自與交戰。背後張飛趕來。聲吼如雷。布
慌衝走。忙奔下邳。侯成引兵接應去了。關張
相見。各言失散之事。關公曰。我在海州路上
藏避。打聽消息。故來至此。飛曰。弟在崆峒山
落草為寇。二人來見曹操。又見玄德。拜哭於
地。谷紋禮畢。同操入徐州。糜竺接
無危。玄德甚喜。陳珪父子參拜曹操
大宴犒勞諸將。操居中。玄德左。陳

“三国”里居然有海州地名

李洪甫

新文化运动以来，小说挣脱了“小知者所及”、“君子弗为”的羁绊，高擢于大雅之堂，拥抱着“道听途说”，“街谈巷语”的“狂夫之议”，卓立于“中国古代文学现象的顶峰”。“才子书”，已不足于奖掖小说的特质和品位，明清小说顶戴着“名著”、“经典”的桂冠，成为广被全球、播传最为深远的中国文学著述，超过易经、兵书乃至孔老夫子笔端的文献经籍。

可是，让古今读书人常常拍案叹喟的是，小说家们非但不认同“才子书”的美誉，反而自认笔下的无端和荒谬。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上，很难看到作者真实的署名，哪怕是字号抑或化名，这也是小说名著大多遭遇著作权公案的主要成因。

所以，吴承恩指称自己的《西游记》是：“漫说些痴话，赚他儿女辈，乱惊猜！”

睿智的荒唐

吴承恩是明代文坛知名度很高的才子，朋友们经常规劝他要：

“珍重大才行瑞世。”

有着较高文学素养的淮安知府陈文烛对吴承恩的才情也深为推崇：

“缘情体物、其辞微而显，其旨博而深，淮自张文潜以后，一人而已。”

张文潜即宋代诗人张耒，在陈文烛的视野里，淮人之中，吴承恩是独领风骚 500 年的人物！如此一位胸藏翰墨、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会不知道唐代高僧玄奘的籍贯在洛阳偃师陈留，不在海州？会不了解唐代贞观纪年里没有“己巳”这一年？会不知道唐代不可能沿用明朝的兵制制度？此类的荒唐，居然皆得以在《西游记》中再现。明代著名的“十才子”、“金陵四家”之一的朱应登看重年轻的吴承恩，曾将自己的藏书分了一半给淮海浪士……一位常年为人写碑铭、作词表的文坛大儒手边没有一本小儿启蒙时期就要临摹的褚遂良的书品《圣教序》？以

至在《西游记》中收录这份出自“贞观之治”缔造者之手笔而又传播甚广的唐代文献时，狂妄无知地刀斧齐下，随心所欲？

就是这样的“满纸荒唐言”，蕴藏着大师的睿智和深不可测的文胆、才力。

玄奘和李世民是《西游》故事中最主要的两个现实世界里的人物，当他们作为小说的原型走进“经典”之后，在吴承恩的笔绘墨染之下，迭经文学的幻化和熔冶，成了体悟作者心智和胸襟的艺术形象，借以震世骇俗，感化苍生，讽喻时政，指挝当今。作者以超人的胆魄，借多国君王的淫逸无道，鞭挞着他所处时代的昏君和暴政，把被道士丹药弄得神魂颠倒的嘉靖皇帝推向耻辱柱，领受千古的唾骂。

小说的可贵，小说家的聪慧，正在于此。这一文学的认知，写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里，语文教科书里。

《西游记》的“扯淡”和“荒唐”

《西游记》经典有着通篇的荒唐。比如：中国科举史上，没有一名海州籍的士子中过状元，也没有一位名叫陈光蕊的状元公；陈光蕊的儿子已经成为著名高僧，李世民还说于江流儿出生之前中状元的陈光蕊是“新科状元”；唐僧也不可能从洛邑人变成“海州”人；《西游记》是以唐代为历史背景的故事，书中却出现了许多明代的文物制度。

唐僧的外公殷开山，实有其人，正史有传。“新、旧唐书”、《通鉴》、《通典》，对他皆有详略不同的记载，但他从未做过丞相。可是，在被视为名著的《西游记》明刊朱本里，唐僧的外公殷开山在长安城中居然建有一栋豪奢的丞相府。以致假明代大学者李贽之名的叶昼“批评”《西游记》中的唐僧家世是“扯淡”和“说家荒唐”。

唐僧不仅并没有成为唐太宗的御弟，也没有得蒙皇上为他送行，正相反，他是背着朝廷、偷越国境而走上西行之路的。玄奘归国后，唐太宗的“圣教序”是应唐僧的请求而写作的，并非如《西游记》第一百回所说，是因为被“御弟之功”所感动“一夜无寐”，“口占”了那首著称于世、从童生到大儒皆曾经背诵并作为字帖临摹范本的《圣教序》。

《西游记》不仅改了《圣教序》的写作背景，更自如挥洒，将唐太宗原文中的“六百五十七部”经书更改为“凡三十五部，计五千四十八卷，”，与第八回如来所说的“三藏共计三十五部”以及第九十八回的“共计三十五部”、“共三十五部”多次对接，还精准地呼应了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祖本之一《西游记杂剧》中的“金经五千四十八卷”；明代的杨闽斋、李卓吾、叶昼以及清代的张书绅等学者和小说家、批评家乃至出版家，皆毫不犹豫地趋从了小说作者，而不是太宗皇上。

可贵的说家荒唐

四大名著兼及诗、词、骚、赋，曲、论、赞、表等所有的文学形式，扪触当代，贯通古今。它的缔将多为饱学强记的博闻宿儒，于经、史、子、集，触目成诵。无论讲史证道，还是劝世言情，自然笔下生花，展促裕如。可是，检阅章回，细审文字，四大名著的行行珠玑之间，堪称满目荒唐。

《三国演义》是一部讲史特征尤其鲜明的小说，在沿革建置甚至皇室世系的大要上，居然也不很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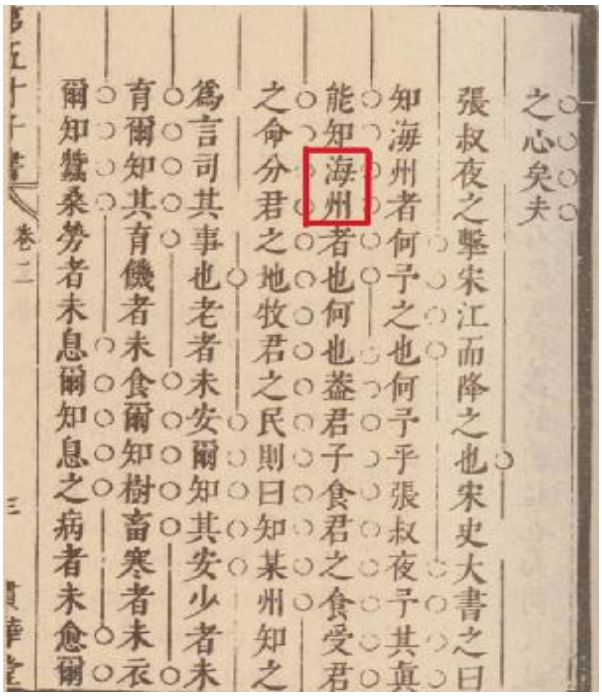
比如，《三国演义》的主演刘备的家世与史德有声的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存有明显的抵牾。关于刘备的皇子，《三国志》的《蜀书·先主刘备传》里明确地交待：“章武元年（221 年）五月，立皇后吴氏子禅为皇太子。六月，以子永为鲁王；理为梁王”；而《三国演义》在第三十四回《刘皇叔跃马过檀溪》中却说：“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生刘禅”。“甩龙”刘禅能有两个生母？

《三国志》的《蜀书》在记载蜀国的后妃时，没有相关糜夫人的记录，但在《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刘先主遗诏托孤儿》里，糜夫人居然有了一个明确的皇后的名份：“尊皇后吴氏为皇太后，谥甘夫人为昭烈皇后，糜夫人亦追谥为皇后”。“海州”，始现于东魏武定七年（549 年），三国时代（220～265 年）决无海州这个地名，“与世寡合”的才子罗贯中硬是要从那位义胆千秋的大刀关云长的嘴里吐出“海州”这两个字来——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门楼吕布殒命》里，关云长对张飞说：“我在海州路上驻扎，探得消息，故来至此。”关圣人能预知 300 年后的地名？侯宝林说相声，为了调侃，硬要“关公

战秦琼”，这不，早在明初面世的《三国演义》的白纸黑字里，大刀关公自己就想着“战秦琼”。

另外，与吴承恩篡改《圣教序》一样，《三国演义》也不会照抄《出师表》：“临表涕泣，不知所云。”而《蜀书》所录的《出师表》是：“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宋史》记录张叔夜在海州知州的任上指挥水战，招安宋江。施耐庵却一定要把战场搬到山东，将一顶与张叔夜毫不相干的“济州太守”的乌纱硬套在张叔夜的头上。


之心矣夫
張叔夜之擊宋江而降之也宋史大書之曰
知海州者何予之也何予乎張叔夜予其真
能知海州者也何也蓋君子食君之食受君
之命分君之地牧君之民則曰知某州知之
爲言司其事也老者未安爾知其安少者未
育爾知其育饑者未食爾知樹畜寒者未衣
爾知蠶桑勞者未息爾知息之病者未愈爾

金圣叹指出《水浒》里的济州是海州

被誉为“中国古典现实主义之终结”的《红楼梦》，在结束语里慷慨陈词：“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将历史和小说的边缘剥离得尤为直白：

“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里翻阅历来的古史……笑道：‘果然是贾雨村言了……既是假语村言……乐得与二三同志，酒余饭饱，雨夕灯窗之下，同消寂寞，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题传世，以你这样寻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了。’”

你看，曹雪芹的葬花诗与唐伯虎的《落花诗》

唐伯虎说：“一年三百六十日，寒则如刀热如炙”；

曹雪芹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唐伯虎说：“花前人是去年身，今年人比去年老……明年来看知是谁？”

曹雪芹说：“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曹雪芹的《桃花行》与唐伯虎的《桃花庵歌》不仅立意修辞相同，而且皆使用连珠体。

《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桃花行》：“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

你希望曹雪芹一字不差地照录唐伯虎吗？

被列作十大名著之一的《镜花缘》，作者是个善于“繁征博引、包括靡遗”，“于学无所不窥”的学者，备受乾嘉学风的熏沐。小说史家王韬甚至指说李汝珍的《镜花缘》是“兼才人、学人之能事”，就学术功底而言，堪称稗坛上的绝无仅有。然而，就是这样一部被鲁迅誉为“与万宝全书相邻比”的力作，也会有关公战秦琼之嫌。例如，第七十二回《古桐台五美抚瑶琴　白术亭八女写春扇》中，作者借彩云之口，夸耀“紫绡姐姐府上的多宝塔”碑版。颜真卿（709～784年）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进士，武则天时代（624～705年），这位大书法家尚未出世，哪来的颜体代表作《多宝塔》碑帖？

你会埋怨李汝珍乱改历史吗？不！《镜花缘》的序说了，写出来的东西除了给老百姓看，更要皇上看！

难怪，李汝珍在《镜花缘》的终卷大发叹喟：“嗟乎！小说家言，何关轻重！”

难怪，小说批评家叶昼说，《西游记》可以有举不胜举的“扯淡”和“说家荒唐”；

难怪，小说家最杰出的代表、稗圣曹雪芹会在开篇卷首就宣告看客：石头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大师们的经典披戴着荒唐，他们的腹笥里深藏着荒唐。

经典的荒唐！

（作者单位：市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张伟敏

赣榆徐福祠远景

赣榆徐福

在东亚的古代石刻

张良群

连云港历史悠久，名人荟萃。赣榆县秦代方士徐福是古今中外颇有影响的国际名人。

二千二百多年前，徐福受命泛海东渡，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先后抵达今韩国、日本，传播华夏文明，造福当地民族。

1992 年以来，笔者先后八赴日本、五赴韩国、数次赴中国冀鲁江浙徐福相关地区，觅寻有关徐福的古代石刻。至目前，东亚已发现的古代徐福石刻

共 9 件，分为碑刻和摩崖两大类。笔者对这些石刻一件件分别实地考察，零距离接触。中日韩三国已发现的古代有关徐福石刻表明，徐福是实实在在的国际名人，受到人们世世代代的虔诚尊崇理所当然。

东亚最早的徐福碑刻

东亚有关徐福的碑刻共 5 件，1 件在中国，4 件在日本。

蓬莱观碑位于中国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驻地丹城，唐大中二年（ 848 年）兴建，元代尚存，明代之后失落，清乾隆三十四年（1796 年），于蓬莱山下掘土时发现。不知何时，蓬莱观碑又不见踪影，只留下原碑拓片（图 1）。碑文首尾 838 字，剥蚀 175 字（《蓬山清话》），不少字难以辨认（以□代之）。蓬莱观碑主要记述了蓬莱观的来历、兴废经过和道教教义。其开头部分“闻图经宝书之蓬莱山，其迹近古。昔相语秦始皇帝使乎仙□辈，徐福也。使泛沧海，访神仙之术于蓬莱山，此□□□□游止之”的记述，明确道出徐福在象山县之行踪。

王庆祥《唐明州象山县蓬莱观碑文考释》（2011 年宁波出版社出版），将拓片碑文逐一考证填补，逐句释读今译，大大方便了今人阅读。蓬莱观碑已于 2012 年夏复建（图 2）。

秦徐福之墓碑（图 3）位于今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徐福町徐福公园内，阳文曰：“秦徐福之墓”。碑系绿色片岩勒刻而成，高 1.4 米，宽约 0.5 米。碑身和碑座未加雕琢，保持天然形象，显得古朴自然。经考证，秦徐福之墓应建于约十三世纪二十年代之前，秦徐福之墓碑建于约十七世纪中叶。

秦徐福碑（图 4）又称徐福显彰碑，位于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徐福公园内，建于天宝五年（1843 年）。碑高约 2.5 米，宽约 1 米，由黑色状石灰岩雕制而成。上方横镌“秦徐福碑”四个篆字。阳文约 1270 字，铭记了徐福东渡日本的历程及对其造福于当地人民的赞美。

据《新宫市志》记载：徐福显彰碑，自 1763 年以来曾先后筹建 3 次。现秦徐福碑为 1940 年复建。

鹤塚碑（图 5）位于日本山梨县富士吉田市福源寺内，建于宽政十年（公元 1798 年、嘉庆三年）。

鹤塚，为一未曾琢磨的形如寿桃的巨石，上镌“鹤塚”两个隶字。鹤塚碑立于鹤塚旁，上镌楷书“鹤塚碑”。铭文为 255 个楷书汉字，记述了孝灵时秦徐福结伴求药东海神山，逮到于此，造福于民，死后化鹤，民官在福源寺，建塚立碑，予以纪念的史实。

肃道日正居士碑（图 6）又称徐福子孙墓碑，位居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妙善寺福冈家世代墓的左侧。2007 年 2 月，笔者来此考察，目睹了生动的一幕。该碑为一不规则的巨石，高约 l.5 米，已断裂成 3 块。大概因长年风雨侵蚀，字迹不清。但仔细辨认，尚依稀可见。墓碑正面镌“肃道日正居士”6 个大字，右左两边分镌一行小字，分

别是“天文二十三年甲寅”、“正月十一日”。碑阴竖镌 6 行计 96 个正楷汉字。

碑刻明确记载，政肃族的祖先为徐福，以福冈为姓的缘由，是取徐福之“福”字。政肃墓即徐福子孙墓，建于天文二十三年甲寅（1554 年、明嘉靖三十三年）

东亚已发现的碑刻中，建造最早的是中国的蓬莱观碑。它比藤泽市徐福子孙墓碑早 700 余年，比富士吉田市鹤塚碑早 950 年，比新宫市的秦徐福碑早 995 年，可谓东亚最早的关于徐福的碑刻。古代徐福碑刻对于考证徐福的行踪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东亚存世历史最久的徐福摩崖

东亚有关徐福东渡的摩崖计 4 件，1 件在日本，3 件 在韩国。

华城山文字岩(图 7)在日本三重县熊野市木本町华城山脚下的岩石上，竖镌五言绝句汉字诗，这就是古今闻名的华城山文字岩。诗曰：

惊去徐仙子　深入前秦云
借问超逸趣　千古谁似君
梅华仙史题

摩崖前立一木柱，竖镌“文字岩”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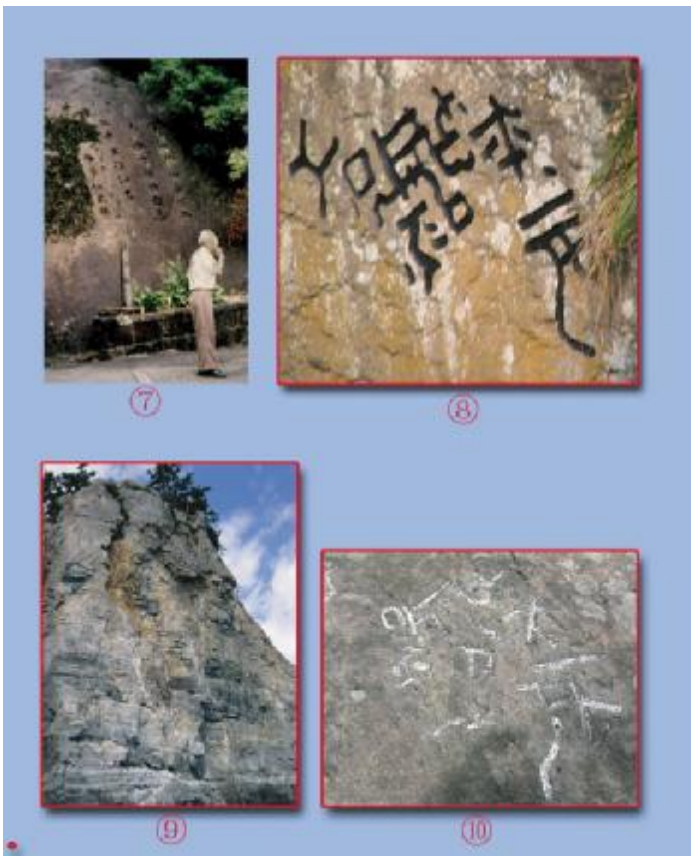
1992 年 8 月我去考察时，熊野市民俗研究者桐本逸鬼介绍，此首关于徐福的诗为宫川南谿（梅华仙史）先生写于宽政七年（公元 1795 年、清乾隆六十年）。

西归浦“徐市过之”摩崖（图 8）现韩国济州道西归浦海岸的正房瀑布石崖上的“徐市过之”刻字，籀文，为今人复刻。2007 年 2 月，笔者首次去此考察。

当地传说，秦始皇派徐福带领五百名童男童女寻找长生不老药（韩国称不老草），徐福率众登上汉拏山，寻遍山谷，终于寻得不老草。他们下山处就是位于山南的正房瀑布，看到雄伟壮观的瀑布自绝壁落入大海，被这美景深深吸引，于是在此绝壁上刻下“徐市过之”四个大字，以作纪念。

19 世纪朝鲜著名学者秋史·金正喜被流放到济州岛时，发现“徐市过之”，并留下了拓本。19 世纪朝鲜最具代表的书法家梦人·丁鹤乔对此亦做考证：“秦始皇二十八年，方士徐福等与童男童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药，过朝鲜国耽罗岛（即济州岛），刻石壁曰‘徐市过之’。此‘徐市过之’四字之刻，已至数千载，哉东古迹，无有及于此。”

巨济岛雨祭峰“徐市过此”摩崖(图 9)位于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岛海金刚雨祭峰。1959 年被台风侵



袭摧毁，字迹荡然无存，只留下一片暗褐色的痕迹。2010 年 10 月 6 日，我第一次乘船考察这处摩崖时，确实看到雨祭峰悬崖上有一片颜色与周围不同，呈暗褐色。巨济徐市留宿地研究会李武弘会长指认，“那里就是‘徐市过此’岩刻遗址。”

当地传说、今人考证、朝鲜末期文臣李裕元（1814–1888 年）《葛岛石刻歌》记载，举证了海金刚雨祭峰摩崖为“徐市过此”的可信性。尤其是李裕元亲自考察并做了拓片，巨济市已退休的公务员金荣乭目睹过“很早就在书上看到过海金刚‘徐市过此’岩刻照片”的证言，更佐证了“徐市过此”石刻的真实性。

南海锦山“徐市起礼日出”摩崖（图 10）位于现韩国庆尚南道南海郡尚州里锦山石崖上。2011 年 10 月 1 日，我有幸考察了这处摩崖。据当地口耳相传：徐福一行到达现在的南海锦山下的碧莲蒲和豆毛蒲，以锦山为中心，一边打猎，一边寻找长生不老草，一边进行军事训练加强防御，并派数只船去寻找蓬莱山、方丈山、瀛洲山。他们发现了现在的济州岛后，全体移居到那里住了数个月时间，离开南海时，在锦山上留下了岩刻。此传说在韩国广为流传，为考证锦山石刻提供了生动的佐证。

朝鲜官吏吴庆锡（1831～1897 年），先后 13 次以朝鲜王朝的外交官的身份前往中国，曾将锦山上的石刻拓片送至燕京，请清朝咸丰年间员外郎何秋涛考释为：“‘徐市起礼日出’六字”，“定为秦时遗迹”“是在李斯小篆之先”，“乃籀文字”。我在现场请教日本考古专家赤崎敏男先生，他表示：“从石刻阴文 v 型刻痕看，应为秦代遗迹。”

“徐市起礼日出”刻制时间应为公元前 210 年前后，即辰国时代末期。据当地传说，西归浦“徐市过之”、雨祭峰“徐市过此”摩崖的镌刻时间，应与南海锦山徐福摩崖镌刻相差不远。锦山徐福摩崖是韩国诸多有关徐福摩崖中唯一存世的石刻，也是东亚唯一现存的年代最久的徐福遗存。

石刻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形式，由于难以修改和不易受人为损害，而具有其保真性和持久性等特点。东亚古代徐福石刻记录之事，有的虽为传说，但传说往往是提炼历史中某些事实而来的，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地位。东亚古代徐福石刻，生动地佐证了徐福曾在今浙江沿海驻足；他率领的童男童女及百工，曾抵达今韩国和日本，给当地民族带去福祉。

中国著名诗人臧克家纪念鲁迅诞辰 100 周年诗作《有的人》中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东亚不同国家、不同时代镌刻的有关徐福石刻，应给予人们深刻的启示：二千多年前的徐福早已死了，但“他还活着！”

（作者张良群，副研究员，中国徐福会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任、连云港市徐福研究所所长，本刊顾问）

责任编辑　张伟敏

明清志书中的海州风俗概述(下)

——兼议其在现代的传承与变异

宋继奎

(接上期)

四、从婚嫁习俗看,普遍俭朴,绝少论财

明《隆庆海州志》载:“婚姻论财,乡野有一二为之者;士夫则彼此简朴,全不责财力之往来。”王城《赣榆县志》载:“婚娶六礼备,不计财定聘;婴孺论门楣,不相男女。”即只要按封建婚礼进行,不计较彩礼多少,但为幼儿相亲讲究门当户对。张奇抱《沭阳县志》载:“婚礼重亲迎,六礼不备,不论财。”即婚礼重在男方到女方迎亲要隆重,六礼(采纳、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不必样样完备,也不讲究财物多少。相比之下,赣榆要六礼完备,沭阳则不苛求。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不论财。揆之海州地区婚娶绝少论财,其实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在大多数人民贫困的情况下,要想论财、六礼要样样齐备,是不现实的。乡间平民有少数论财的,也是想通过嫁娶索些财礼以助生活。知识分子彼此不论财,一则是彼此一般为门当户对;二则若论财,则显得有损于其平素看重的身份、面子。

延至后世,因海州地区仍然经济疲弊,人民贫困,大多数人家婚娶仍不论财。还有因贫穷,少女到男方家做童养媳,男子到女方家“倒插门”的婚俗。甚至出现男方因无力迎娶而到女方家“抢亲”的现象。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还有“换亲”的现象。即因男女双方家境贫困,儿子均娶不上媳妇,遂由父母做主,将各自的女儿嫁给对方之子而换回对方之女为己媳。如此谈何“婚姻自主”,说来令人心酸!

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婚俗大变,突出表现在一是论财,二是婚礼铺张浪费。五六十年代时不论财,甚至双方将铺盖抱到一起也能结婚。七八十年代结婚大多要“三转一响一咔嚓,家具 36 条腿。”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了无数万至数十万彩礼,无房子甚至无车子不肯结婚的现象。婚礼仪式中西各具,异彩纷呈。婚宴大操大办,动辄数十桌上百桌。各种糜费不一而足。有的是因富摆阔,有的是当官的乘机敛财,有的是出于无奈打肿脸充胖子,婚后慢慢还债。

五、从丧葬习俗看,大多比较看重,也有的借办丧礼“以相夸诩”

由于受孔孟之道“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和“视死如生”以及祖先崇拜、神灵崇拜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丧礼一般都比较讲究,甚至讲摆场。明张峰《隆庆海州志》载:“营丧以时,更无停柩十数年者。然居丧不按《家礼》,丰酒食,具鼓吹以待吊客;多妆绢亭,广搬彩戏以相夸诩。而不务

戚哀者，今亦渐变而从礼矣。”张峰对这种现象斥之为“丧葬之礼文备寡实”，即徒具形式而无哀悼之实。并说这种现象“在汉时已然”，可见其源远流长。清初陈宣《海州志》也说“明时，出殡之家具鼓吹，丰酒食以待吊客”，但因“吊仪极薄，故丧葬所费不资，贫家有数丧不举者”。针对这种陋习，“天启甲子（1624年），学正倪效先令有丧之家，亲友分执其事，礼尚往来，俗为之变，至今营葬以时，无停柩。”《康熙海州志》也说丧礼请戏班子唱戏，“即孝子顺孙不免随习俗而夺哀感”。为此，“州学长倪效先会同以大义晓谕，土民感服，弊俗因之一变”。可见，行政力量对移风易俗还是有“晓以大义”的引导作用的。

相对而言，赣榆的丧俗较好，王城《赣榆县志》说“居丧有遵朱子《家礼》不事浮屠者，营葬以时，不以风水淹岁月，亲族力赙，分执事，号称善俗”。但“近有宴客而演剧夸闾里者”，王城对此斥责：“亦何心哉！”

沭阳的丧俗也较讲究。张奇抱《沭阳县志》说“丧礼厚棺椁，间有举大殓（尸体入棺）、小殓（尸体穿衣）者。吊奠从俗，亦不废浮屠。至葬，亲族分执事，祭祀惟时”。所谓“祭祀惟时”，即除在治丧期间按规定时日祭祀（如“服三”、头“七”至五“七”）外，“四时祀先皆于暮，寒食、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皆祀焉”（王城《赣榆县志》）。在这四个时节的晚上（若白天上坟除外）烧纸祀先的习俗至今犹然，谓之“望烧”。

上述厚葬习俗惟有财力或大家族才能操办，沉重的经济负担在一般人家恐亦勉为其难。据笔者所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能“具鼓吹丰酒食以待吊客”的已为数不多，一般皆具棺木停柩数日即入土为安。吊仪亦极薄，讲究礼尚往来。贫者只能买薄皮棺材，请不起吹鼓手。极贫者只能用几张芦席将死者卷卷埋了。七十年代实行火葬以后，农村中有将骨灰又装入棺材重葬者。城市中也有将骨灰封土造墓者。可见传统观念和旧习俗一时难以完全改变。

近一二十年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出于对死者的孝敬，或因死者生前受罪多、没有享福，出于忏悔、“补偿”心理，现在予以追补，于是对丧礼大操大办。“具鼓吹丰酒食以待吊客”的比比皆是。请戏班唱戏“以相夸诩”的也不乏其例。

六、从医药习俗看，生病多求巫医，不尚医药治疗

海州在战国时曾属楚地，而楚地巫风盛行。所谓巫风，是远古人神不分的意念的残余，指以女巫主持的祭祀降神的风气。《汉书·地理》说：“其俗尚巫鬼”、“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受此遗风影响，海州地区民众生病，认为是鬼魅作祟，便请巫觋作法驱鬼祈祷，以求病除。张峰《隆庆海州志》说：“病不医药，多事祈禳，村落也间有之”；“州信巫鬼不尚医药。故药品虽多，取而蓄之以治疾者少也。”明《淮安府志》说赣榆“疾病但求巫”。至清代仍然如此。清陈宣《海州志》说：“病不医药，多事祈祷。云台、朐山产药品虽多，然不知取以治疾。”

对于巫医治病的愚昧行为，张峰在《隆庆海州志》中就曾感叹：“夫风寒暑湿，过则生疾，脏腑症结，岂鬼物所能湔浣漱涤者乎？甚矣，人之愚也！”

时至今日，这种愚昧的行为也未完全绝迹。有的人生病久治不愈，有人就说这可能是得了“仙病”或“鬼”在作怪，去庙里烧香祷告，或找“有道行”的人施法。有人因经过医疗等多种因素结果病好了，便说是因烧香或巫医起的作用。因而传播开去，迷信的人便越发相信鬼神。由此联想到现今满街的测字算命相面打卦，风水师的种种摆布，庙里叩拜以求富贵的扎堆香客，不相干的地方也树起大佛，甚至在机关门厅的地面上也镶嵌八卦图案，室内摆放“辟邪”的物件。如此等等，这到底是怎么了？实在是二十一世纪的悲哀！

通观明清志书记载的海州民俗，使我们对那个时代海州先民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有了基本的了解。由于时代局限和观念立场的原因，修志者对某些事项或多溢美或多贬抑之词，对此我们不应苛求古人。时代在前进。我们应当与时俱进，激浊扬清，使良风美俗得以继续传承，陈规陋习得以涤除移易，以期“再使风俗淳”！

（作者单位：市公安局）

责任编辑　张伟敏

新年话年俗

张名艾

提起过年，我就想起家乡、想起小时候、想起那喜气洋洋的年味和那些淳朴厚重的春节习俗。时光虽过去五六十年，但昔日家乡的“年俗”，至今记忆犹新。

年的来历

中国人过年（元旦、春节），起源于农耕时代的夏朝，距今已有 4000 多年历史。古老的新年习俗很单纯，就是合家团圆祭天、拜地、敬祖宗，而且元旦（大年初一）的时间并不一致，夏朝在一月，商朝和周朝在腊月，秦朝在十月。直到汉武帝时期，重新修订历法，规定（农历）正月为一岁之首，正月初一为元旦（俗称大年初一）。从此，过年就成为举国上下一年中最神圣、最喜庆的盛典，并一直延续至今。

1949 年 9 月 27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为了区分公历和农历两个“年”，又因一年二十四节气的“立春”恰在农历新年前后，故把公历一月一日称为“元旦”（俗称阳历年），把农历一月一日称为“春节”（俗称阴历年）。

春节与其他传统节日不同，欢度的时间拉得特别长，一般从“祭灶”（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算起，到“元宵节”结束，共计二十多天。唐朝贞观时期和现代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是从“腊八节”算起，那就是三十多天了。而且整个春节过程，各个“节点”都有特定的内容、程式、规范和风俗习惯。

进入现代，春节的许多古、旧和带有神秘、迷信色彩的习俗逐渐被简化、异化、甚至淘汰，与时俱进地增加了现代元素，充满了庆丰收、庆团圆及欢乐祥和的内容。

祭　灶

我国的春节，从祭灶到除夕，是喜气洋洋忙过年阶段。有人把这个阶段，用现代时髦话说成是节日过渡时期。

祭灶，是一项在我国民间影响很大、流传极广的风俗。约定俗成，出门在外的游子要在这一天之前赶回家，参加全家祭灶活动，随后与家人一起忙年、祭祖、过年。

民间传说，灶王爷，全称“九天东厨司令灶王府君”，是玉皇大帝派驻各家各户的“特命全权大使”，俗称灶君、灶老爷。他以锅台为“府”，常年审视一家老少的言行举止、功过是非，保护这家人的安宁。家家尊灶王爷为一家之主，平时有成绩时，会到灶王爷前报喜，有过错时，会到灶王爷前忏悔。全家老老小小都想讨灶王爷喜欢，怕“得罪灶老爷，没有好果子吃”。

这一风俗，粗看起来，似乎愚昧可笑，但细想起来，确有正面意义。如果人人头脑树立起强烈的是非荣辱观念和敬畏感，经常自我总结检讨，自觉反思校正，那一定会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有利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传统的祭灶风俗很讲究，程序也比较复杂。祭灶活动都安排在日落黄昏后。家家户户在灶（柴火锅台）前，摆上香烛供品，麦芽糖和大摞“祭灶饼”，一家人依次面对“灶爷灶奶”跪拜行礼，轻声祝愿灶王爷一路平安，希望他“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大人把用芦柴、花纸扎成的“香笼”、“天梯”、“毛驴”、“元宝”等放进灶膛焚烧，掐下一点供品扔进火中。先行礼拜的长辈到门外放鞭炮。在鞭炮声中，后辈们把墙上的“灶爷灶奶像”请（揭）下来，争先恐后拿着麦芽糖“糊”他们的嘴。意图是让他们“上天多多说好话，不要讲自己的坏话”。当灶王升天（在灶膛化为灰烬）后，姐妹兄弟利用“没有灶王监督”的机会，毫无顾忌地嬉闹，用麦芽糖糊兄弟姐妹的嘴，有时大人也乘机赶热闹，“闹”得全家一片欢声笑语。

一年中，只有祭灶这一天、送走“灶爷灶奶”这一时刻，好像老少尊卑礼数都忘了。那种民俗、那种幽默、那种欢笑，儿童时代我曾经历过许多次。五六十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仍觉回味无穷。

古城年味浓

迎年与庆年

解放前后的四五十年代，虽然绝大多数家庭都很清苦，但是，迎年与庆年时的隆重、热烈并不比现代差。

那时候，祭灶前后，各地都有一些德高望重者、社会活跃分子、地方文艺骨干，会无私地为营造当地新年喜庆而献计出力、忘我地忙碌着。有的掏水井、清河沟、修桥补路、打扫公共场所；有的搭松蓬、制花灯、写春联、挂牌匾；有的排练地方戏，练踩高跷、跑旱船、耍麒麟、跳财神；有的准备演出的戏台、场地、道具；有的忙着杀猪宰羊、杀鸡宰鸭、煎鱼炸丸，赶办年货。到处是迎接新年的热气腾腾景象。

大年初一、初二、初三，是农村庆祝新春“狂欢节”。

白天，到处锣鼓喧天，各处的演出队纷纷出动，在本地演出后，再到其他地方献艺，一比高低。村头、广场上经常是人山人海，耍狮、舞龙、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玩杂耍、唱小戏、说大鼓书……轮番亮相，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

晚上，露天广场上黑压压一片，坐满了顶风冒寒的男女老少，深情地观看台上土生土长的演员自导自演的淮海戏。演出条件十分简陋，戏台上挂的“汽灯”在寒风中忽明忽暗，演出服装道具东借西凑。但演员都很投入，表演认真，唱腔委婉动听。现在还记得，那时他们在演出《窦娥冤》、《皮秀英四告》、《王三姐守寒窑》时，唱到动情处，引得台上台下哭声一片。

祭祖

四千年的春节文化习俗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而唯一没有变化（或者说变化不大）的风俗就是春节祭祖，虽然各地祭祖形式不尽相同，但“尊宗敬祖、感恩行孝”的主题是一致的。

家族祠堂祭祖，是旧时过年的一项重要内容。大约我五六岁时，曾随父亲、哥哥参加过两三次春节家族祠堂祭祖仪式，至今还有些印象。

旧时农村大姓家族都有祠堂，供奉着祖先的牌位。祠堂有专人看管，平时大门紧闭，显得十分庄严、神秘。祠堂祭祖仪式一般在除夕前一天，只许男性参加，由族长安排程序，主持祭拜。到场者，不分富贵贫贱、年老年幼，一律按辈分、“房支”排列。仪式包括烧化纸钱、燃放鞭炮、磕头礼拜、族长训话等。这种风俗，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族色彩，具有排他性，解放后，这一风俗基本自动废止。五六十年过去了，封建宗族观念已被淡忘，但传统的祠堂祭祖经历，至今仍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在中国南方及港澳台和新马泰等地，祠堂祭祖呈现复原态势，认为这样祭祖既利慎终追远、和亲睦族，又老少咸宜，也可避免“上坟烧纸”引起火灾危险。

“上年坟”或除夕“家祭”这一风俗还被继承着，人们在欢庆新春佳节的时候，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先和故去的亲人。

2004 年、2007 年我在桂林孩子家过春节，见到大年初一“上坟”祭祖情景，令我惊叹不已。早上太阳升起时，一些家庭（靖王后裔）带来桌子、板凳放在墓前，摆上香炉烛台、茶杯酒具、碗筷、丰盛的供品和食物，生起篝火、燃放鞭炮、焚烧纸钱、叩头礼拜。这比中国多数地区除夕前“上年坟”要隆重得多、复杂得多，并充满欢乐与喜庆。

除夕与守岁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这是唐王李世民《守岁》诗中的诗句。除夕，“新桃换旧符”，辞旧迎新。

这一天，男女老少都要登场，各显其能。“忙年”期间准备好的果品、烟酒，烹制好的鸡、鱼、肉、蛋，新添置的衣、帽、鞋、袜，准备好的鲜花、彩灯、年画、春联等都要一一亮相。

中午过后，家家户户会对室内外作最后一次清理布置。紧接着就是贴春联，有的人家还要贴年画、窗花、“门挂”，小康人家还会装彩灯、挂灯笼。贴春联时，一般要燃放鞭炮，表示旧的一年已经“送走”，新的一年姗姗而来。

守岁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吃，从日落时开始，有的大户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全家人兴高采烈地围坐一桌，调皮的晚辈会催促长辈“发表演讲”（相当于做家庭一年总结），大人话音刚落，晚辈们会争先恐后给长辈敬酒、夹菜，七嘴八舌地说些祝愿他们健康长寿和不忘他们恩德的话。大人也会针对儿孙情况说一些事业有成、学业进步、万事如意之类的祝福话语。在欢庆、祥和的气氛中，老人们尽享天伦之乐，后辈们尽享呵护与亲情。一顿年夜饭，扫除了一年中的恩怨烦恼，展示了新一年的美好愿景。

1983 年以来，因为中央电视台除夕夜长达四五个小时的晚会直播，延续几千年的除夕守岁习俗发生着重要改变。许多家庭的“年夜饭”提前在下午三四点开始（城里一些家庭，中午或晚上，安排在饭店吃“年夜饭”），全家人欢天喜地、大吃大喝几个小时，大人给孩子发完“压岁钱”，就让他们各回自己的“安乐窝”。即使一家人聚在一起，昔日的话题和温馨往往被欣赏春节电视晚会所代替。这些年，人们在感谢中央电视台送来春节文化大餐的同时，对失去的年俗年味，总有一种留恋、遗憾和失落感。

节　点

春节风俗的丰富多彩，欢乐喜庆的层出不穷，还表现在“节点”上。

完整的春节，在古代大约有十五个“节点”，例

如：腊月初八过“腊八节”；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祭灶；二十五接玉皇（赶乱年）；二十七洗浴日（扫尘）；二十八、二十九“祭祖、上年坟”；三十晚，阖家吃团圆饭，除夕守岁；正月初一鸡日（大拜年）；初二狗日（出嫁闺女回娘家）；初三羊日（亲友聚会）；初四猪日（走亲会友）；初五牛日、财神日（破五、送穷王，商家开门迎客）；初六马日；初七人日（又称小人节）；初八谷日；初九天日；初十地日（石婆干妈生日）；十二（古海州过小年）；十五上元节（元宵节、放焰火、狂欢夜）。

各个节点各有主题，并有特殊的风俗要求。进入现代，上述“节点”半数以上已不流行，只有老人还能如数家珍，讲出它们神奇的民俗内涵。有的“节点”则与时俱进地增加新的内容，例如初五（财神日）企业家欢聚、签约、放高升、开门迎客；初七（小人节）家长学生给老师拜年，全家及亲友给孩子过节日。

春节走向世界

民俗文化是一种力量、是一种情怀、是一种影响、是一种温暖。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传统节日风俗是人们丰富多彩生活中的亮点、兴奋点，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具有神奇的魅力、凝聚力。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今天，中华民族的春节已经走向世界，2004 年美国纽约州宣布中国春节（大年初一）为法定假日，不久世界许多地方效仿。2005 年春节，我在加拿大度过，亲历唐人街、华人华侨聚居区，扑面而来的春节风俗、浓烈的节日氛围、繁华的节日经济，其声势、欢乐程度完全可与中国两岸三地媲美。许多西方人感到华人的春节风俗特别温馨、丰富多彩，让他们羡慕和神往，愿意与华侨华人一道分享。

世界有形心无界，炎黄子孙从农耕时代以祭天、祭地、祭祖先开始形成的古老春节风俗，用现代科学思想观察，许多带有不真实的外貌，但历经几千年，它们既然能与无数传承者的感情寄托、心灵期盼对应起来，也就有了某种深层的真实，底蕴深厚，向心力、凝聚力无比。尽管这种真实隐伏着大量随机和错位，但历史常常有求于传统习俗产生的力量。这种软实力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体现的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对生活的善良愿望；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思想和高尚的民族情操。

节日文化与节日经济互为因果、拉动内需、促进繁荣，推动着历史前进，记载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和宽广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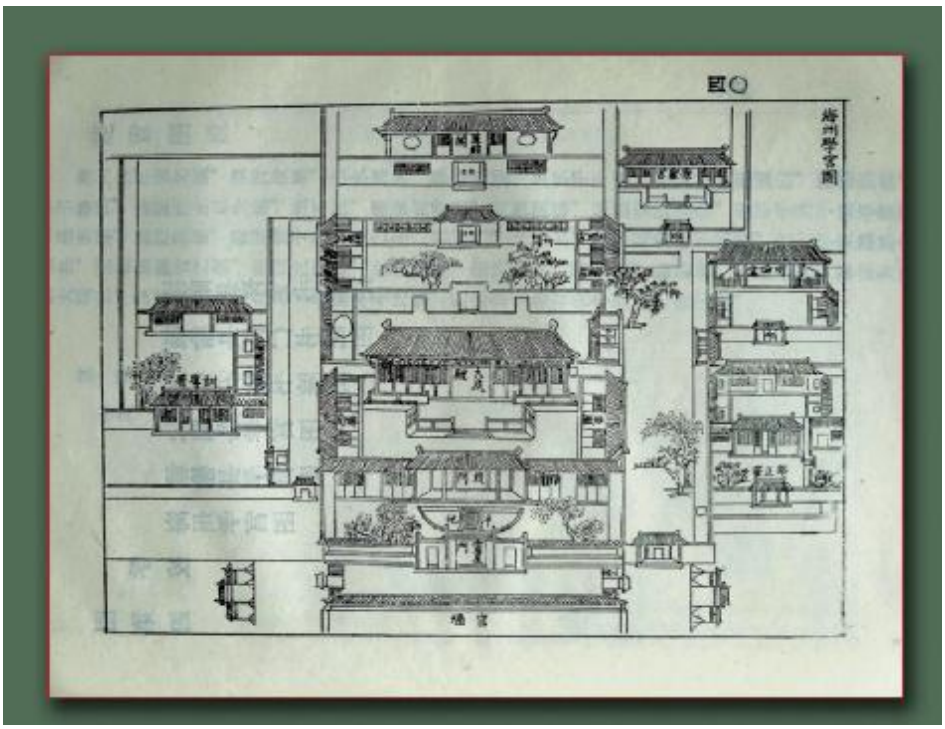
（作者张名艾，连云港电视大学助理研究员，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民俗学会，中国管理科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　张伟敏

苍梧绿园’2013 港城新春大集

海州文庙名宦祠

张树庄



海州学宫图

在海州这方古老的地方，人们对孔夫子的敬仰由来已久。建庙祭祀，并与建学校相结合，成为我国在封建社会重视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表现。庙学就是孔庙和学校的结合，或称为学宫。学宫内，除祀立孔子神像外，还同时建有名宦祠、五贤祠、忠义祠等。名宦祠是庙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位于学宫旁，别立一祠。这些名宦有幸进入天子门墙，和诸先贤紧邻，位置特殊，目的是为了昭示后学，厉行教化。

名宦祠的建设是国家倡导的。《钦定大清会典》：“直省府州县，附庙左右，各建忠孝、节孝、名宦、乡贤四祠，岁春秋释奠。”《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第一·图第四》绘有《海州学宫图》，该图清楚地描绘了海州学宫的结构。最南边是宫墙，宫墙北边是棂星门，过了棂星门是泮池，过了泮池上的状元桥就到了戟门，如今海州文庙的戟门还在，位于海州中大街小学院内，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过了戟门就是大成殿，大成殿院内有东厅和西厅。大成殿后一庭院，东侧设有名宦祠和五贤祠，五贤祠即乡贤祠。西侧为忠义祠。最后一个庭院是尊经阁。在这一主轴线的东侧有前后两个庭院，前为学正署，后为明伦堂。主轴线西侧的庭院为训导署。

明洪武二年（1369 年）明太祖下诏文庙附祭乡贤名宦，自此，明初庙学开始附建名宦祠，明嘉靖十三年（1534 年）国家把名宦祠别立一祠单独祭祀。清代对名宦祠政策承继明代，归于群祀范围，由国家遣官春秋祭祀，以地方管理为主。海州的名宦祠明代就已有之。《隆庆海州志·卷五·教典》：“名宦祠，旧邻察院，今移入圣殿西，久废。隆庆六年（1572 年），知州郑复亨重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第十九·考第六·祀典二·祠宇》：“名宦祠，旧

州志:旧在东门,近察院,后移大成殿西。知州郑复亨重修。今案在殿后东北。”

什么样的官员才能称得上名宦呢?“名宦者以政传非以官传也。”不论官位高低,只要是在当地政绩显著,惠泽于民的官员可以称为名宦。明清名宦按其职位可以分为县令名宦、儒学名宦、主簿名宦等,按其政绩可分为抗旱救灾、狱讼公正、恤政爱民、忠义报国等。名宦者只有死后才能入祀。地方上历来名宦很多,但并非所有的名宦都可入祀,是有一定标准加以限制的。名宦祠奉祀的是本地区历史上有一定政绩的官员,是为当地作出贡献的官员。明清两朝能够进入名宦祠的,标准即《礼记》所讲的“施民法,死勤事,劳定国,御大灾,捍大患。”具体施政措施体现在抗旱救灾,狱讼公正,忠义报国,恤政爱民,宣扬教化等。目的是崇德、报功、劝忠、尚义。明清之制,县级官员任所必须隔省,下级官员也需隔县,因此这些官员都是外籍人,把他们的名位安放在名宦祠内,不仅是本地区人民对他们的追思,也能给后来者作表率。

海州名宦祠内明代供奉的名宦,据《淮安府志》记载,有汉代的汲黯、尹翁归。汲黯是汉武帝时的东海太守,为政时使郡中大治。尹翁归是汉宣帝时的东海太守,“以治郡高第,入为右扶风”。后汉有黄浮、徐璆。黄浮,恒帝时东海相,刚正不阿,执法如山。徐璆,献帝时东海相,“威化大行”。刘宋时期的袁粲,为梁东海太守,清廉有操。隋代有张孝征、元暖。张孝征,东海令,筑西海堰捍潮,民得免水患。元暖,东海令,在苍梧山与巨平山之间筑两堰,外捍海潮,内贮山水,民获灌溉之利。唐代杜令昭,海州刺史,时海涨,杜令昭筑永安堤,以防民患,闾里歌之。宋代有李清臣、石延年、孙洙、张叔夜、侯冨5人。李清臣,字邦直,通判海州,清俭自持,居官奉法。石延年,字曼卿,宋神宗时海州通判,廉能有为,吏民悦服。孙洙,神宗时知海州,灭蝗救灾,为民争利,免民赴役。张叔夜,徽宗时知海州,围歼宋江,率师支援汴州。侯冨,海州通判,拒敌城外,壮烈牺牲。明代有陈德辅、陶晞、陆远、林廷玉、许懋5人。陈德辅,浙江钱塘人,洪武初知海州,明代开始,立州治,安流民,复生产,民颂之。陶晞,江西南城人,成化五年(1469年)知海州,有守有为,众务具举。陆远,浙江秀水人,成化九年知海州,清修耿介,大公无私,破案如神。林廷玉,福建侯官人,弘治十二年(1499年)谪判海州,刚明果断,民服其公,修理学校及祠庙坛埠。许懋,海州州同。清代入祀名宦祠的有17人。他们是:余正健、张榕端、许汝霖、施世纶、邵嗣尧、张元臣、张泰交、于成龙、范成勋、傅腊塔、董纳奉、郎廷极、陈鹏年、卫哲治、唐仲冕、翁咸封、陶澍。从汉至清海州名宦祠内共祀有35位名宦。

关于申报翁咸封入名宦祠一事,还有很多周折。翁咸封(1750—1810),字子晋,号紫书,晚号潜虚。江苏常熟人。翁心存父,翁同龢祖父。乾隆癸卯(1783)举人,嘉庆三年(1798)官海州学正,著有《潜虚诗钞》。翁咸封在海州政绩显著,名望极高。去世后,海州百姓没有忘记他,道光四年,由海州生员张敦悌等9人联名公呈,让翁咸封入祀海州名宦祠。继任学正王吉士、知州师承祖、江苏巡抚陶澍分别签署呈报,但却受到时任两江总督琦善的否决。道光十一年,海州生员们第二次上书,请准翁咸封入祀名宦祠,并得到时任海州知州的合署,这一次又遭到江苏巡抚程祖洛的否决。道光十二年,海州人再次呈文,才得到礼部批复:奉旨依议。至此,历经十年,三次奏请终于有了结果,海州学正翁咸封终于入祀名宦祠。

最后入海州名宦祠的是两江总督、兵部尚书陶澍。陶澍在海州的影响非常大,不光入祀名宦祠,还在板浦设专祠。

入祀名宦祠的历代先贤,他们都为海州人民的福祉,为这块土地的建设作出了贡献,海州人民永远记住他们。明清名宦祠依附于文庙,其祭祀形式大体同于文庙,但规格是不同的。比如文庙用太牢礼,而名宦祠只有少牢礼。国家正是通过这项精神教化的措施,对官员崇德、报功,对百姓劝忠、尚义。名宦入祀即是国家用先前的模范官员树立榜样,激励后来的官员尽职尽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时也起到了劝导后学奋发读书,积极参政,忠君报国。

(作者单位:连云区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张伟敏

祥云观或是栖云精舍的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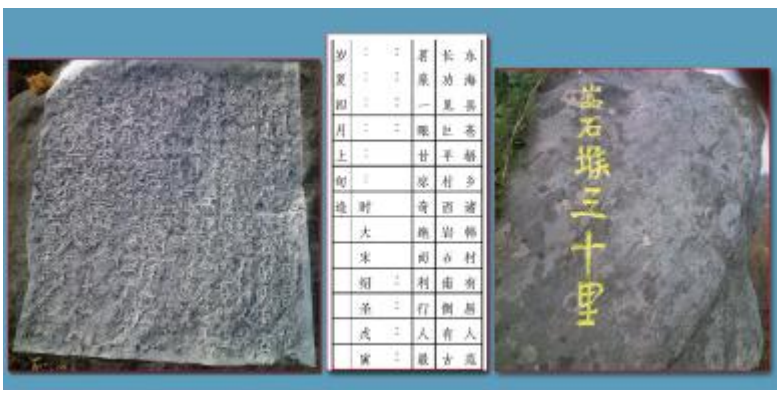
李正耀

栖云山、巨平山

在《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下称《唐志》)问世前后,对于栖云精舍所在的栖云山,让人一头雾水。比如该志在第 526 页“巨平山”条下曰:“《方舆纪要》:州北三十里,此山北岭为栖云山”。第 529 页又曰:“《太平寰宇记》:在东海县东北四十一里,即巨平山北岭。梁明僧绍遁迹于此。此山高渺,故号栖云。”顾乾的《云台山志》(下简称:《顾志》)曰:“东海城东,在诸季庄。沃壤抱其后,隔峰屏其前。”崔应阶的《云台山志》(下简称《崔志》)曰:“在诸曹村北,华盖山东三里”。众说纷纭,让人摸不着头脑。

同是栖云山的“栖云精舍”所在的巨平山,居然在位置上大相径庭,非东即西:《唐志》按:“明僧绍之郁州,住舁榆山栖云精舍。是此山古名舁榆也。”

《方舆纪要》载巨平山在“州北三十里”的说法是准确的。因为清时东海县治所在今天的南城镇。海退以后,从南城出发,沿着凤凰山、九岭山、大小村、猴嘴山头的平陆路,去巨平山,距离与“州北三十里”说法,基本吻合。而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关于“在东海县东北四十一里”说,为宋时的地貌,与云台山在海中有关。虽然行走的方向一致,但是,路不在平陆,而是沿着岸线绕弯的山坡路。因此,路途就长了。不少年长者称巨平村为“海里”。如今,朝阳小山脖西北坡,同在半坡路边的《泉井石刻》、《岩石堠三十里》说明北宋绍圣戊寅岁,人们步行只能沿着山麓行走。因此乐史的“四十一里”说就可信了。从南城出发,绕行山麓小路,路程就多出了十一里。否则,就不靠谱了。虽然时过境迁,但仍然殊途同归。“岩石堠三十里”刻石与《方舆纪要》的表述基本一致。反过来又佐证了“岩石堠三十里”刻石或与裁海所设的边防有关,刻于清中晚期。



“泉井”石刻、“岩石堠三十里”石刻

“泉井”石刻上，阴刻“苍梧乡诸韩村”、“巨平村”的地名，说明大宋绍圣戊寅年甚至更早，巨平村就在巨平山下了。北宋建隆元(960)年前，重新修建的海清寺阿育王塔“第一给”时，就使用巨平村制造的砖。《顾志》所说的巨平山“在诸季庄”、《崔志》的“在诸曹村北”的说法与事实相悖！

明僧绍之郁州

关于明僧绍，《南齐书》第 487 页曰：明僧绍(？～483 年)，字承烈，平原鬲(介于今山东省平原县、德州间)人也。他的祖父叫明玩，为州治中；他的父亲叫明略，为给事中。明僧绍，于宋永光(465 年)中，隐居于长广郡崂山(今青岛)，聚徒立学。(465 年)淮北地区沦陷以后，乃南渡江去了建康。在昇明年间，明僧绍弟庆符为青州刺史，而明僧绍到了建康以后，缺少粮食吃，就随着其弟明庆符一起到了郁州。住舁榆山栖云精舍，欣玩水石，但从不去州城。

据《宋书·顺帝纪》第 107 页：“升明元年(477 年)七月丙午，以安西将军明庆符为青、冀二州刺史。”也就是明僧绍来郁州的时间。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关于“梁明僧绍遁迹于此”的表述，缘于其躲避朝廷要他做官、远离京都一事而言，故用“遁迹于此”。

明僧绍主要生活在宋、南齐。480 年移居摄山，483 年卒于建康。“僧绍乏粮食”是其到郁州的重要原因。那么，青冀二州侨置于朐县，朐县的情况如何?

据《宋书》：元徽四年(476 年)夏五月乙未，尚书右丞虞玩之向朝廷作经济报告时指出：当前政府所需要的一切开支，只能依靠淮海地区，这里的“海”，即沿海地区，当然，包括青冀二州侨置的沿海地区——朐县。明庆符之前，是知州刘善明，刘善明治理有方，因地制宜，因“郡境边海，无树木。善明课民种榆杂果，遂获其利”，反映当时的海岛经济形势很好。故明僧绍随其弟来郁州，衣食无忧。

《南齐书·列传第三十九》第 536 页曰：“始兴太守房法乘……身长八尺三寸，行出人上，常自俯曲。青州刺史明庆符，亦(身)长与房法乘等。”意思是说，这两人一般高矮。行走在途，很远就可以见到他鹤立鸡群。与人交谈，得弯着腰。

明僧绍德才兼备，甘守清贫，誓不做官。其《传》曰：“随庆符之郁州。住舁榆山，栖云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

明氏曾经生活、聚徒立学的地方就是笔者的家乡。栖云精舍，依山傍水(海)，松竹常青，鸟语花香，彼时侨置的青冀二州，治所就在搭山脚下。明僧绍不入距离仅十里左右的州城，亦说明栖云精舍的环境让他割舍不下！

明庆符在职期间，即“建元元年(479 年)冬”，帝(萧道成)给即将赴任青冀二州接替明庆符任刺史的崔祖思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要崔祖思到任后，在天气凉爽、栖云精舍有释道讲座的时候，到明僧绍那儿去一趟，转告萧道成的意图，让明僧绍和离任的明庆符一起回到建康来，出任正员郎。建元二年(480 年)三月，其弟“庆符罢任，僧绍随归，住江乘(今江苏省句容北)摄山”。 太祖(高帝萧道成)坚持擢其为官，明僧绍以病婉拒。最后只好赠僧绍竹根如意和竹荀皮编制的斗笠作罢。此说明明僧绍与帝王非同一般的关系。

明僧绍有个儿子叫明山宾。据《梁书·明山宾传》曰：明山宾(443～527 年)，父僧绍，“普通四年(523 年)迁散骑常侍，领青冀二州大中正”。其叔明庆符任青冀二州刺史时，治所在搭山。四十三年后，因为老县城已经于公元 520 年的海难中消失了，青冀二州州治，此时已经在新址新县了。离其父明僧绍昔时“聚徒立学”的舁榆山“栖云精舍”仅咫尺之遥，免不了代父旧地重游。

《山宾传》记载这样的事：“山宾性笃实，家中尝乏用，货所乘牛，既售受钱，乃谓买主曰：‘此牛经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后脱发，无容不相语’”。意思是说：他虽然做官，但是家中经常拮据，无以维持生计。只好将曾经患过病，但是早就治好了、而且现在正在使役的牛卖掉，买主看好并且付了钱，牛刚要牵走，他又不放心，将牛曾经生过病、虽然已经痊愈，要买主注意养护，防止掉毛。买家听后，立刻不买了。百姓得知其父子的为人忠厚老实、有诚信！

舁榆山易名栖云山

舁榆山，怎么易名栖云山的?

彼时青冀二州侨置于朐县，即今民间传说的“石花县”所在地——搭山，在刘善明的经营下，生机勃勃。而舁榆山地处朐县县治之西南约十余里的巨平山北坡，四面高山：南为巨平山，西为西山，又叫吕母崮，北有马(鞍)山，东是大东山，大东山北连狮子山(山麓即汉东海孝妇祠)，又连烟墩山。彼时，马山、烟墩山、狮子山应该是相连的，如今的朝阳汽车站处在狮子山、烟墩山之间，它是那一段路的制高点，吴铁秋所著《苍梧片影》第 149 页记载民国 10 年(1921 年)3 月 9 日，魏鹭西先生的游记曰：“晨由新浦……十八里抵猴嘴……复东缘山脚行，经将军庙，十八里抵新县。县傍(大)东山(山)麓，相传为旧东海县治……细雨淅沥……抵娘娘庙避雨。庙为东海孝妇祠。绕山角东行，峰峦回抱，有马山、虎山、弁雾等山，至山麓尽处，山峰中断，地平衍。”此文是最有力的佐证！只有西北方向，马鞍山与吕母崮之间无山，今名沙河口。随着潮起潮落的海水进出此似盆地的环境中。海水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蒸发，水气上升，与山气相搏，形成雾霭，漂浮于半空之中、涡旋如云，即便由西北风刮进来，云雾只能在道观周围打转转，出不去，散不开，栖息于或笼罩在舁榆山上，遇到阴天，更是如此！小时候，秋天的清晨登山，摘山榴红(山楂)，就曾经在山凹间遭遇云雾，而迷失了方向。就是因环境相对封闭，空气的流动性很差形成的。所以，山再“高渺”，无特定环境，难以“栖云”。

明僧绍曾住傍海的崂山，聚徒立学，其环境也是云雾缭绕，舁榆山不亚于崂山。因此他决定于此兴建精舍。建成后的“精舍”，远望朦朦胧胧，若隐若现，犹如云中仙阁。僧绍讲学、栖身于此，取名“栖云精舍”！舁榆山也因此变成了栖云山。从此，舁榆山名，渐渐地被历史所湮没，被后人所遗忘。

山名更改的例子不少：如石棚山，原名万花岩。因北宋石延年读书处关系。而万花岩一名，知之甚少。再如：谢禄山、孔望山、田横崮、吕母崮、由吾峰等等，都因历史人物而得名。

精舍，是“集生徒讲学之所……亦称僧、道居住或讲道说法之所”。栖云精舍亦不例外。诚如《晋书·孝武帝纪》第 135 页说：“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六年正月……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领沙门以居之”就是明证。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栖云精舍”就是明僧绍居住、讲学的地方。用时尚的话来说，就是讲授释、道知识的教室。

栖云精舍啥样？建在何处？山上还是山下？未见相关史料。

祥云观就是栖云精舍遗迹

《唐志》第 1167 页：“祥云观，《赵一琴续志》：在巨平村南，观前二池，常出云”。

“观前，常出云”，“栖云精舍”？顺着这个思路，笔者回忆起上世纪五十年代时的所见：时刚十岁上下，有亲属住小前庄、小竹山，新春拜年，礼尚往来，必经此观南侧，观坐南朝北，为四合院，三间正殿，东西配殿各三间。周无居户。门前石级两侧各有树一株，耆老说，1939 年日寇火烧吊在树上的无辜百姓，树与共亡。东西大小碑各一块，已经破损。现只剩竖刻“节励”右半边的残字碑；院前藕池东西向，观东为南北车路，南抵巨平山，北通巨平村；路、观间，井一眼，水甘凉清澈，久不干涸；凡遇干旱，观附近的小前庄、张巷、刘巷、曹巷、甚至稍远一点的韩巷居民，都会到此井取水。

年幼时，以为庙堂里塑的神像，少有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的菩萨，看到的都是凶神恶煞、狰狞可怖的影像。因此胆怯，从不敢单独进入，所以对于当时观内的情况，一无所知。

今天看到《唐志》载祥云观(见下图)“观前，常出云”，觉着该观就是明僧绍时期的“栖云精舍”。理由如下：

祥云观历史照片

首先，祥云观的位置，与弇榆山（栖云山）上“聚徒立学”的“栖云精舍”位置一致：在巨平山的北岭，栖云山的北坡，巨平村之南。值得指出的是，十七世纪前，山下则是海水荡漾，波光粼粼。彼时的巨平村应该是与栖云精舍同在等高的山坡上，互为睦邻。海水退去以后，山下现出平陆，居民渐渐地从山坡移居山下，久而久之，成了现在的村落。而平陆则成了桑田。

第二，栖云精舍主要“讲事”即研究讲授佛教、道教的地方，讲佛学、道学的课堂。明僧绍，来郁州之前，也曾在崂山、摄山“聚徒立学”。“栖云精舍”亦然。就是因为上述的功能，“祥云观”图片清楚的告诉我们，其前后墙的上半部，似透光，与一般庙宇或有区别。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娘娘庙、海州的大庙等只有门，未见窗。而该观前后墙或有窗。

第三，观是道教场所。据《南齐书卷五十四·顾欢传》第 493 页得知：“明僧绍”著有《正二教论》，以为“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称长生不死，名补天曹，大乖老、庄立言本理”。此段文字是说，佛使人有觉悟、有智慧，做善事，不做恶事，目的明确；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对于人生的诠释是全面的。整天恪守长生不死信条的人，其思想守旧、闭塞。相反，有了觉悟和智慧的人，就思想开放。而今，有的道人，沉迷于炼丹，以服丹药追求长生不死，则大大背离了老子、庄子的教义。证明明僧绍不仅仅精于佛教，而且对于道教也有精湛的造诣。他在升明元年（477 年）七月来到郁州建栖云精舍，志在“聚徒立学”。受业者既有佛家弟子，也有道家弟子。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祥云观的周边环境，已非昔时光景。山下的海水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1 年）消失了，沧海已经变成了桑田，丧失了产生水汽的条件，因此，“栖云”不见了，“栖云精舍”名存实亡。祥云观“观前，常出云”，是观前的藕池水汽形成的，与曾经的栖云现象相比，可是小巫见大巫了！那所出的云偶然在某一天，因为百姓看到了阳光透过水汽衍射出五彩缤纷的云朵，认为是祥云，会给人们带来吉祥，故名“祥云观”。从而取代了栖云精舍，而“栖云精舍”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模糊了所在。

或曰，栖云精舍怎么成了道家的场所？

明僧绍可是不分释道的。他著有的《正二教论》就是极好的证明。当然，其身后就难料了。

宗教界都晓得中国有“三武一宗灭佛”的历史变故，为“寺”改“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直接影响东海佛教的，是唐武宗的灭佛行为。即唐会昌四年（844 年）三月，“时帝志学神仙，师（赵）归真，归真乘宠……排毁释氏”。《资治通鉴》曰：会昌五年（845）五月……毁山野招提、兰若……余僧及尼……皆勒令返俗。寺非应留者，限期，令所在毁拆。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曾于开成四年（839 年）四月初七非法入境东海县的日僧圆仁，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其所见所闻曰：会昌四年（844 年）三月敕……不许置供及巡礼等，“如有人送一钱者”、“如有僧尼等在前件处受一钱者”、“诸道、州、县应有送供人者，当处捉获”，皆“背杖二十”。因此，“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送供”。还下令焚烧经教，毁拆佛像。七月十五日，又令毁拆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也许，因栖云精舍已为道观，才幸免于难。

到了明朝嘉靖皇帝，释道并行。东磊的延福观就是由崇祯三太监出资修建。

清顺治十八年的“裁海”，沿海岛屿的村民、释道寺观僧道徒，无一例外迁移内地，寺观荒芜至康熙十七年，复海后，返回的也许不是原来的僧道徒了。

综上所述，栖云精舍，就是朝阳镇刘巷村南祥云观的前身。也是连云港道教方面除三元宫外的最早道观！遗憾的是：今已不存。

责任编辑 张伟敏

『众妙开山』前云台山清风顶宗教流布情况述略

陈贵洲

云台山清风顶图

清风顶即前云台山以三元宫为中心的前顶一带。“众妙开山”指明神宗万历年间山阳人谢淳毁家，与众弟子建成三元宫的壮举。三元宫的建成，使云台山名噪一时，一度位列“海内四大灵山”之一。然而，耀眼的光环，逐渐掩盖了“开山”前诸大德高僧的筚路蓝缕，致使这段历史逐渐变得扑朔迷离，甚至淹没在苍茫迷雾之中。

一

三元宫创建前，清风顶一带有无寺观？多少寺观？初创于何代？沿革情况如何？至今尚不清晰。关于清风顶宫观的肇始，目前常见的有唐代说和宋代说。据《云台山志·卷四·艺文》帅颜保《重建云台山青峰顶碑记》中云：“（三元宫）发迹于唐，重建于宋，敕赐于明，其来久矣。”明张兆增在《敕赐护国三元宫海宁禅寺碑记》中说：“相传旧有梵刹，创自唐朝，开山僧未知何人。”说明明清时期云台山一带存在着唐代即庙祀三元于前顶的说法，不过二人所记，大抵以父老口耳相传为依据，没能拿出确凿依据，尤其张氏似乎也怀疑此说，除了强调“相传”，还接着特别感叹道：“如赵宋时师秀、铁面诸老，时往来淮扬间，不知何以未闻住锡于此，抑龙象蹴踏之境，显晦固有时耶？”而明张朝瑞在《重修清峰顶大仙庵记》中给出了一个明确答案：“庵之建肇自宋皇祐四年（1052年）。修庵者，明成化己酉（乙酉之误）有清风，弘治戊午有净善，嘉靖戊午、隆庆戊辰则老僧道融……戊辰之后，赖刺史杨

公之力居多。”编订《云台山志》的崔应阶赞同此说，并引用顾乾旧志云：“大佛寺，在圣宫东，本名大仙庵。《顾志》：‘创自宋皇佑四年’，明万历二十二年重修，更名海宁寺，建大佛殿。今废，大佛像尚存。”此宋代说有明确的创建年代，似有所本，较为可信，然至今也未发现直接而明确的互证材料，姑且存而备考。

二

目前所见方志中最早记载清风顶一带宗教活动情况的是《隆庆海州志》。该志由嘉靖到隆庆年间三任知州廖世昭、张峰和郑复亨共同完成，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十六世纪海州地方的史事，其卷八之“寺观”篇云：“清风顶二仙观，在东海。”继后，《康熙海州志》“寺观”篇除了重复“二仙观，在清风顶”，又增加“三元庙，在云台山”。两部志书以如此简洁的笔墨记载清风顶一带的宗教情况，极为罕见，也极不寻常。避开修志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不谈，如此寥寥数语的确为厘清这段史事设置了很多困难，留下了众多遗憾。

按，“东海”、“云台山”，此处均指清风顶；“三元庙”即“三官殿”或“三元宫”，有诸家论述，当无疑问。三元宫和二仙观之间又是何种关系，渊源如何？出土于三元宫、现存连云港市博物馆的《大仙庵碑记》提供了线索。为论述方便，现将《大仙庵碑记》正文释录于下：“予暇游大仙庵，览形胜天□，□开辟缘空，因从访历迹。释氏□洋稽手乃告曰：‘始传顶名金牛，有仙居，道成不知何代，惟存庙址。’迄皇帝成化三年，师祖号法清峰，方创庵度徒，能戒持，勤至律，□端修，常趺坐一室，而感四方□□，甘奉贽者擦肩接踵。师祖生于正统丙辰，卒于弘治壬子。□继实难，庵亦寻坏。弘治十一年，有师宝芳复修，广前迹，未□□，又随敝弟子大洋，朔祖师芳尘。既□不可绳，惟思苦心勤体，易榱拔道，以无坠法门耳。□大□绝口，故老托余勤崇本源。余见碣石已拱，因无让以记云。皇帝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林下越朐书。”碑后附有纠首、施财、信商、住持人名姓，其住持为道容，道容徒弟德（连）。

这个“有仙居”的金牛顶，查崔应阶《云台山志》：“在清风顶后，俗呼为后顶。顶有金牛洞，一名二仙洞，相传金牛二师修行于此。”在今人看来，后顶指金牛顶，前顶指清风顶，不过，在明代中晚期，清风顶和金牛顶区分并不明显，往往可以混同。如张朝瑞《东海云台山三元庙碑记》：“是名青峰，又名金牛顶。近代大仙庵有僧名清风，居民严事之。”其《重修青峰顶大仙庵记》进一步明确说：“其巅曰清风顶，亦曰金牛顶，顶之平宽衍沃处，而大仙庵于此建焉，大仙洞在其东……”据此，大仙庵的前身当为二仙观，为道家修炼场所，其建造年代，“不知何代”。到明成化初年时，已毁损严重，“惟存庙址”。成化三年（1467 年）清峰（即清风）和尚在此开始“创庵度徒”。

又据明顾乾《云台山志》：“成化己酉（为乙酉之误，实指成化元年，1465 年），有鲁府王孙，落发为僧，持钵于此。爱其山水幽峻，可以栖禅，因募资重建，师号清风，久而遂以清风名顶。”由此可以推知，成化元年清风祖师初到清风顶一带时，应当是因陋就简，先对旧观稍作修葺，然后四出募缘，于成化三年正式大修，开始“创庵度徒”，大概在此时二仙观便正式更名为大仙庵，完成了由道教宫观到僧人主持、佛道并存局面的转变。清峰生于正统丙辰（1436 年），至成化三年 31 岁，卒于弘治壬子（弘治五年，1492 年），享年 56 岁。在清峰祖师的努力下，大仙庵有了较大发展，影响进一步扩大。

三

那么，除了大仙庵，清风顶一带是否还有其他寺观庵堂呢？长期以来，学者往往忽视这个问题。其实，稍加留意，便会发现在万历十五年谢淳大修云台之前二年，即万历十三年（1585 年）冬十月，时谪为海州州判的唐伯元在其《游青峰记》一文中，即明确记载游历路线中，“遂遵山麓而南且上，上下可七里，是为朝阳庵。……从西下钓鱼沟，……转而南游朝阳庵”，两次路过朝阳庵，并且该游记后由海州贡生顾乾刻于“朝阳庵”左右，即今之天然碑。于此可证大仙庵之东路至少还有朝阳庵等宗教庙宇的存在。

2012 年，我与市文物保护志愿者对清风顶一带的宗教遗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12 月 9 日，在今三元宫西涧原谢淳祖师灵塔——谢老塔（升仙塔）废墟旁终于有了重大发现。谢老塔虽已不存，而塔基保存则较为完整。在西塔基护坡中线偏南处一

块不规则巨石上，东西并列两则题刻。东侧题刻共三行，因石面风化严重，且文字不甚规则，经仔细辨认，内容为："嘉靖三十年（1551 年）十月初一日 创立常便沟 明月庵。"其中"常便沟"三字待考。右侧题刻镌于脱去石皮的光滑崖面上，清晰如新，内容为："会竟妙法，得济圆明；兴龙宗祖，永受元红。临集二支。僧人宗龄立。祖真、祖信、祖进、永干。匠人刘月。"该刻未着年月。从地层关系分析，西塔基土层部分掩盖题刻，推测二处题刻均早于灵塔建造年代，不排除同为嘉靖年间镌刻的可能。查《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引李普元《东海志》："（康熙）三十一年奉赐'遥镇洪流'匾额。……渐复旧观。僧众数百人，分住三十六所……明月庵，在殿西沟大涧坡中，今废。"位置与新发现的明月庵完全吻合。在现存所有旧志中，明月庵均作为三元宫建筑群三十六所之一而存在的，而谢老塔旁题刻的发现，证明明月庵早在嘉靖三十年就已创建，比三元宫早 36 年而存在，说明大仙庵西路也存在着明月庵等其他宗教庙宇。

在大仙庵北路，玉皇阁东百余米公路下方 50 米处，近年发现一处名叫"镇靖庵"的寺庙遗存，庵后崖壁上有题刻二则，一为"镇靖庵。辛卯年僧人圆科置。"一为"临济枝。"其"辛卯年"为干支纪年，无法确定该庵的确凿建造年代，似亦不晚于三元宫的创建。另，后顶即金牛顶下有北海观音寺，建于何时，史籍无考。据《康熙海州志》"后顶观音寺"条："寺在清风头之后，面北，俗称为北海观音。白莺紫竹，常现云中。其开山僧相空立一石上，不避风雨，但食松枝，如是者三年。"《云台山志》"立禅石"条："在倒座崖侧。《赵续志》开山僧号相空，立一石上，不避风雨，但食松枝，如是者三年……"这里都提到一位法号相空的禅师在后顶倒座崖上立禅三年，成为开山僧。而到了清嘉道年间，这位相空禅师却突然被无相禅师即德证所取代。《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后顶观音寺"条："《陈志》一名倒座崖，在青峰顶之后面北。俗称为北海观音……开山僧无相立山岩一石上，不避寒暑风雨，但食松枝三年……"道光年间的《云台新志》"立禅石"条："在倒座崖侧。开山僧无相立一石上，不避风雨，但餐松枝，如是者三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最合理的解释是无相禅师于万历十五年开始在前顶大修三元宫后，名动宫禁，被称为开山祖师，自然需要神化，上至官吏文人下到香客信士，只需将"相空"略改一字，便可达到目的。只可惜弄巧成拙，反而使后人更加坚信后顶的开山僧是相空，并且远比无相开山要早。同时，民间一直流传着"拆了后顶盖前顶"的说法，也即利用拆除北海观音寺的部分建筑材料修建清风顶的三元宫，从侧面也佐证后顶的北海观音寺成寺时间早于前顶三元宫建筑群。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记载的三元宫建筑群

四

清风顶众庵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朝阳庵、北海观音寺的沿革情况无任何文字流传下来，这里姑且以大仙庵和明月庵为研究对象。明代晚期，佛教禅宗五派以临济、曹洞、尊宿三流影响较大，其中最盛者为临济宗。由于寺院遍布，僧徒众多，传承体系不一，为清理门户，整顿法派混乱现象，临济宗尤重旁嫡之分，规范法派传承，然而凡事都过犹不及，明末四大名僧的憨山德清在评临济系时就说："临济一派，流布寰区，……后传至弘

正末，有济关主，其门人为先师云谷和尚。五十年来，师弦绝响，近则蒲团未稳，正眼未明，遂妄自尊称‘临济几十几代’。于戏，邪魔乱法，可不悲乎？”“其海内列刹如云，在在僧徒，皆曰本出某宗某宗，但以字派为嫡，而未闻以心印心。”(《卍续藏》卷127)憨山德清原则上承认法系的作用，并且也以云谷法会的弟子自居，却不以临济法派的传承者自许。而且抨击明末临济宗人，在蒲团未坐稳、正眼未明时，便妄自乱称临济宗的几十几代了。那不是由以心印心的师资相承，而是由于所住寺院的开山祖师隶属何宗何派，该寺住持也就成了何宗何派，那不是流传佛法，而是当作世法来子孙相接的。前述大仙庵、明月庵、镇靖庵等均为临济宗派，自然也免不了受时俗的影响，重视法系字派。不过，也正是这些记载，为我们留下了一把了解真相的钥匙。明月庵为临集(济)二支，其字派传承为：“会竟妙法，得济圆明；兴龙宗祖，永受元红。”题刻后的僧人宗龄、祖真、祖信、祖进、永干恰是师徒三代，绝非巧合。镇靖庵也为“临济枝(支)”，其置庵者“圆科”也是“圆”字辈，不过，单凭这一字尚不能判断明月庵和镇靖庵是否属于一个宗派。

关于大仙庵，张兆增《敕赐护国三元宫海宁禅寺碑记》：“清风……嗣法者曰净善，嗣善者曰道融(《大仙庵碑记》中作‘道容’)，嗣融者曰德连。融年百岁，连亦几百岁，尤苦行相继，极力整葺，遂成宝坊。时有客谢淳自淮上来，谒连公(德连)，一接手即深相契，更其名曰‘德证’。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忽一日呼其徒圆林、圆松语之曰：‘我今幻身将掷，汝等可师事谢’。遂以素珠，拄杖授证，泊然而化”十分明确地记载了清风到德连、德证及其徒弟圆林、圆松历代师徒的传承关系，不过，这一谱系尚不完整，并且尚有疑问。据《大仙庵碑记》，立碑时的住持为道容，道容徒弟为德(连)，与张氏记载一致。但是，在清风祖师圆寂6年后，“弘治十一年，有师宝芳复修，广前迹，未□□，又随敝弟子大洋，朔祖师芳尘。”这里的提到的“宝芳”是否就是净善？前文中提到明张朝瑞《重修清峰顶大仙庵记》云：“修庵者，明成化己酉(乙酉)有清风，弘治戊午有净善……”按，弘治戊午即弘治十一年(1498年)，因此，“宝芳”极有可能就是净善。同理，“宝芳”的弟子“大洋”也极有可能就是道融(容)。

德证(无相)之后的师徒传承关系，民国沭阳人吴铁秋所著《苍梧片影》有所补充：“云台山自遇着无相和尚，大兴畚筑，才做着人世蓬瀛。当明神宗中叶时候，江淮大饥，无相趁此动工，救活了上万人，也算是藉工代账的义举。还独创建了三元圣宇，连东海防倭的城，塔湾通津的渡，他都捐资重葺，利国利民，当时称他为禅宗异人，简直是救时佛子。计经始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落成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彼时佐他开工的，有圆林、圆松、圆景、圆福、皆老僧德连的弟子；又有果庆、果满、明玉、明睿、明空、明镇、明璨等，皆能传无相衣钵，创始守成，都是云台功臣，所以顾氏称他们为‘云台众妙’。”在这里又增加了“果”、“明”两代，不过仍不完整。今人孙广良先生在《云台山三元宫史迹补遗》一文中给出了完整的字派传承，认为三元宫宗门定演三十二字，即：心源广绪，本觉昌隆；能仁圣果，常演宽宏；惟传法印，证悟会融；坚持戒定，永纪祖宗。后又接演十六字：智慧清净，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对照明月庵字派传承，区别是非常明显的。由此可见，大仙庵和明月庵并非一支，而是各自独立发展，彼此之间没有严格的隶属关系。

基于上述考证，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自宋皇祐四年清风顶建庵以来，代有修葺，不曾中断。明成化元年，有自称鲁王孙的清风和尚持钵至此，募缘整修，成化三年改二仙观为大仙庵，创庵度徒，弘扬佛法，被尊为祖师。后历经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等朝，历代僧徒灯火相传，素行谨洁，敬贤勤业，多有整修。其间，嘉靖三十年大仙庵西涧创建明月庵，与此同时，北坡镇靖庵、北海观音寺、东岭朝阳庵等庙庵也次第落成，清风顶一带逐步形成较有规模的宗教建筑群。但此时，各庵之间尚未建立起较为严格的隶属关系，而是各自独立发展。直到万历十五年，山阳善士谢淳取得皇家和佛教界尊宿的支持，毁家大修三元圣宇，终于形成以三元宫为中心的众星捧月似的庞大宗教建筑群，揭开了云台山发展的辉煌篇章。

(作者单位：连云港广播电视大学)

责任编辑　张伟敏

“我对共产党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下)

——追记三叔孙若溪的革命生涯

孙苏林

(接上期)

边区斗争传威名

孙若溪被营救出来时,三团已向沭西转移。此时,国民党常备队还在到处抓人,使在仓促转移时未及随队的几十名三团人员有家不能回。孙若溪便和吴月波、厉国桢、丁慎之等人一起将滞留人员安置到潘洼、厉荡、南于庄、孙河口等村庄。孙若溪自家也安排了陈达、汤金山、郑奎生等 3 人,他们在此生活了整整一年时间。

在此期间,孙若溪先后在南草庄、南岗东边圩庄筹办了《实话报》,内容主要为收听、记录延安广播中的中共中央发布的新闻,油印出刊,分送到上马台、汤沟、张店等地,交给坚持敌后斗争的地方党组织。孙若溪还和厉国桢在任庄和朱埝分别组织了读书会,有侍步山、侍伊成、侍民、侍效山、侍森山、侍岳山、任树云、李德超、朱步银、朱万洲、朱启洪、孙芳林等二十多名成员,这些人都在孙若溪和厉国桢的引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另外还有孙存楼在上马台组织的读书会成员十余人,每隔二十余天集中到孙若溪家学习一次,并由孙若溪安排午饭。

1940 年春,沭阳秦庄的地下党员秦奇均来找孙若溪,了解伊山方面日伪情况。孙若溪要求他住下来,在本地发展一批党员,便于开展工作。秦奇均即化名老黄,由孙若溪安排他在瓦房庄孙乾湘家吃、住,根据孙若溪提供的情况,在陡北乡发展了孙乾湘、任树云、侍步山、侍伊成、侍浩山入党,并派李长祥、王怀松、侍岳山等人打入日、伪军,在对敌斗争的最前沿建立了党支部和情报网络。

此时,孙若溪为发展抗日武装,曾多次做匪首孙士武的思想工作,以革命道理和八路军的抗日前途教育他,获得成功,孙士武同意带着他手下的 50 多人参加八路军。当年秋,八路军第五纵队东进苏北,开辟淮海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主力部队到达杨口时,孙若溪即和厉国桢一起带领孙士武的队伍和当地民众武装 150 多人围攻国民党常备队。孙若溪派人给常备队连长孙会川送信,劝他投奔八路军,孙会川迫于压力,同意当八路军。孙若溪遂将孙士武队伍和常备队一个连共 150 多人,带到厉荡改

编，成立云朐大队，孙若溪任大队长。晚上发现孙会川逃跑，孙若溪见事态有变，次日清晨即将队伍带到杨口，与主力会合。部队首长介绍孙若溪带队去盐城，交给主力部队。孙若溪到盐城交兵后，拿着地委书记杨纯的信函，回到了淮海区，受到了区党委的赞扬。狼狈逃跑的常备队连长孙会川随即勾结土匪报复，将孙若溪弟兄三家的粮食、衣物抢劫一空，全家只得去投靠亲戚。灌云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孙笃生知情后，批准调拨 40 笆斗小麦，帮助渡过春荒。

中共淮海区党委分配孙若溪在专署水利科工作，不久调任泗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民政科长。1941 年春，由县委书记郭光裕、县长夏如爱介绍，孙若溪办理了重新入党手续。1943 年秋，经中共淮海地委审查批准，恢复了 1929 年党籍。

1942 年秋，中共淮海区党委为加强边区统战工作，调孙若溪回灌云县工作。县委安排他开辟南岗以北地区，先成立一个班子，名叫海南大队，孙若溪任主任，汤化宾任指导员，有 20 多人枪，在边区活动。数月后，县委以南岗为中心建立六区，孙若溪任区长，于康任区委书记。不久，孙若溪调任紧靠大伊山的朱埝区任区长兼武装大队长。大伊山是日伪盘据的重镇，朱埝即为频遭扫荡的前哨阵地，环境极为艰险。孙若溪为开辟边区，首先在离陆庙伪据点仅 5 里的陡沟河北建立了陡北乡，在敌人控制下的盐河西岸建立董圩乡，并为这两个乡配备了得力的乡干部。孙若溪向他们教策略、教方法，对各种势力做到有团结，有斗争，很快使乡政权得到了巩固。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帮会工作的决定》，中共灌云县委决定由孙若溪负责统战工作，在边区和敌占区搞“安清帮”活动，利用帮会的影响，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争取和瓦解伪方军政人员，达到孤立、打击敌人的目的。孙若溪以安清帮“通”字辈帮主的名义，在边区和伪据点中广收徒弟、学生，在一年多时间里，收徒达千人。在灌西边区，伪军中很多班、排、连级军官和伪人员及多数伪乡、保长都向孙若溪递了学生帖子。他经常在离敌据点只有几里地的地方摆香案，收徒弟，甚至还应邀到杜圩伪据点去赴宴，均未发生过任何问题。由于帮会工作的成功开展，孙若溪专门派一些人到伪据点里干事，作为我方内线，搜集情报。孙若溪还安排人担任伪乡、保长，以控制边沿区政权，统战关系网很快形成。

1943 年底，我淮海第三中学文工团来朱埝区演出，主要剧目有《三星落》，内容是伪军大队长老婆劝丈夫起义反正。孙若溪将文工团安排到离陆庙伪据点仅 6 里路的边区侍圩演出，并作了内紧外松的布置。我方区队负责东盐河线的警戒，陡沟河北对伊山的警戒则交给陆庙伪军负责，孙若溪叫其余陆庙伪军不带武器来看戏。当晚观众有 1000 多人，陆庙伪军也来了 60 多人，戏场秩序和演出效果都非常好。带队演出的孙存楼校长称赞说：“能叫未放下武器的伪军来看戏，使他们直接受到教育，这是对若溪老爷胆略的检验。在三中演戏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场特殊演出。”

离间巧计显神威

1944 年春，孙若溪调任中共灌云县委敌工部长，对外称联络处长。在此期间，先后用离间计惩治了大伊山伪区长高渭清和伪大队长林洪焕，搞垮了伪剿匪第七总队，彰显了我方敌工工作的威力。

汉奸高渭清在日寇盘据大伊山后，助纣为虐，疯狂推行伪化政策。1944 年 6 月，孙若溪派联络股长潘震球潜入大伊山，由我方地下工作者将其介绍给日本宪兵队翻译田守本。一个月后，潘震球以我方爱国民主人士的名义，分别给高、林写假信，大意是赞扬他们的“爱国心”，认为他们“报来的材料很好，将再送上活动经费”，希望他们“多加警惕，防止暴露”。信封好后，故意放在泥地上踩脏，让人将信拾去交给田守本，田即送交新浦日本宪兵队。宪兵队闻讯出动，包围了伪伊山区公所和区大队，将高、林二人抓到新浦审讯、拷打、坐牢，几个月后虽被保释回家，这两个汉奸也都隐姓埋名了。

1944 年春，日本宪兵队特务王若秋在陡沟招安土匪，成立伪“剿匪第七总队”。日寇任命他为少将总队长，下设三个大队，充当蚕食我抗日

民主根据地、推行伪化的急先锋。孙若溪和潘震球决定利用这支队伍中各派土匪的原有矛盾，派我方地下工作者去实施离间计，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导致其部独立大队长孙东被乱枪击毙，其部人员当晚散伙。伪第七总队彻底垮台，王若秋也跑回新浦销声匿迹了。孙若溪的成功之举受到的中共淮海地委的表扬。

抗战胜利前夕，为加强新海连地区的统战和情报工作，淮海地委敌工部决定将边区敌工部门组建为东灌沭工作团，由孙若溪任书记，厉国桢任副书记。同时分设两个办事处，孙若溪任东北办事处主任，厉国桢任东灌沭办事处主任。他们继续用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为本地区的开辟和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教育司法再建功

抗战胜利后，孙若溪调任淮海高等师范学校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1946 年秋，国民党向华中解放区大举进攻，中共淮海地委决定全地区中学组成淮海联合中学，由专区文教处长孙存楼任校长，孙若溪任副校长，率队北撤。至山东省海阳县时，编为山东省建设大学附属中学，1947 年在北城场、石兰沟复课。秋天，国民党 20 多万大军压至海阳，建大附中成立数十人的家属队，由孙若溪带领到山东文登县海边乡村打埋伏。不久，又从石岛 4 次渡海，终于冲破敌人的海上封锁线，经大连北上至鸭绿江边的安东(今丹东)市。孙若溪被分配到中央区任副区长。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山东和华中形势好转，孙若溪奉命率联中家属队渡海至胶东，随军南下，经数千里长途跋涉，于 1948 年春回到淮阴地区。当年秋，淮阴地区大部解放，孙若溪先后被任命为淮阴专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院长。1950 年调任苏北行署秘书主任，后任监察委员会委员、副书记、苏北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1952 年苏南、苏北合并为江苏省，孙若溪任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司法局长，1955 年春调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57 年 5 月，整风反右运动在全省急风暴雨般展开。当时，因省高等法院院长已经调出，由孙若溪临时主持工作，故由孙若溪负责在省级机关扩大会上汇报省高院的大鸣大放情况。由于省高院的一些鸣放内容在当时被认为是攻击党的言论，再加上孙若溪说话直率，于是就成了机关的运动对象。在反右严重扩大化的形势下，孙若溪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当年，省委决定将孙若溪调往淮阴师范专科学校任校长。省长惠浴宇到淮阴时，专门到孙若溪家看望。惠省长对淮阴专署的同志说："孙若溪是一个办事务实的人，忠诚、口快、敢于直言。汤沟事变被捕，被电令枪毙三次，没有怕死，是个钢铁汉子。"

淮阴师专建校不久，且规模较大，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完善，办学水平也亟待提高。孙若溪来到学校后，带领全体教职员工，废寝忘食地努力工作，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61 年深秋，孙若溪突然罹患肝病，不幸于 1962 年 3 月 6 日在淮阴第一人民医院病逝，享年 62 岁，遗体安葬在灌云县烈士陵园。

1980 年，中共江苏省委和省高级法院党组对孙若溪在反右运动中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一事进行了复查复议，并发出了《关于撤销孙若溪同志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决定》指出："现经复查，认为对孙若溪同志所定的错误和事实，与处分是不当的。有的事实不存在，严重失实；有的是孙若溪同志在工作中向上级提出的不同看法和意见，这是党的组织原则所允许的；有的是党组织集体研究做出的决定，不能追究孙若溪同志的个人责任。据此，报经江苏省委 1980 年 10 月 8 日批准，撤销江苏省委 1959 年 1 月 5 日(59)苏字第 13 号文件《对孙若溪同志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

孙若溪离开我们已经 50 周年了，但他那对共产主义理想永不动摇的信念、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斗争精神、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优秀品质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责任编辑　张伟敏

把骨灰撒在海师校园的人

——追记张国华老师的曲折人生

张学贤

张国华老师

我与张国华老师有 4 年师生关系，5 年同事关系，9 年相处留下许多难以忘怀的情景，值张老师诞辰 110 周年之际，特撰写此文，以示悼念。

历经磨难　关键时刻投向人民怀抱

张国华生于 1902 年，祖居江苏涟水县时码乡马老村。家境贫寒，7 岁读私塾，《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过目不忘，仅用 10 天时间，就通读了《大学》课本。翌年，前朱圩创办蔚英小学堂，学监朱国强、教习汪兰甫以《四书》为国文。开学第一天，就教“联字”，用国文中“白米黄豆”四字为题，每字下画三个圈，让学生联字。张国华不假思索地将四个字一气联完，即“白纸写字”、“米饭好吃”、“黄道吉日”、“豆生田中”，教习一字未改，赞其为“小神童”。

1918 年夏，张国华进入县立高等小学，三年后考取江苏省立第八师范预科班（即海州师范前身，校址在板浦），毕业后分配在南城公立第二小学，教语文兼班主任。南城小学出过不少人才，曾担任过唐山铁道学院院长的武可久、原联合国预算局局长杨天全都是他教过的学生。

1926 年 10 月，国民革命军胜利北伐，张国华和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行动起来为北伐军效力。北京大学学生杨某和中学教师武宝岑，以南城小学为基地，组建国民党，首批发展 10 名教工，张国华是其中之一。第二年 3 月组织发展壮大，组成灌云县第一区党部，张国华当选为常委。7 月初，北伐军抵达淮海，学校放假，张国华回到老家涟水，又被推选为阜民乡第十一区党部执行委员。

1931 年 8 月，由于少数人争权夺利、营私舞弊，张国华在区党部改选时落选，从此他就不再参加国民党的一切活动，同时辞去小学校长一职，并于 1932 年考取上海大夏大学师范专修科。由于学习刻苦，加上良师指导，大有长进，先后写出不少有分量的论文，如《中国乡村之面面观》、《怎样做小学校长和班主任》、《孔子教育学说浅议》、《1934 年总理诞生感言》等，分别刊登在《大夏周

报》和《大夏学生》刊物上，博得全校师生的好评。

大学毕业后，张国华本想报效祖国，实现教育救国的抱负，未想到家中连遭不幸，先是三岁的儿子立人遭土匪绑架，被勒索 300 块银元。事后向官方报案，未想到官匪相互勾结，绑匪没有受到严惩，却反咬一口，把张国华投进牢狱，受尽折磨。接着是 1936 年 2 月出生的二女儿，没有满月即夭折；1938 年 10 月，10 岁大女儿被痢疾夺去生命；1939 年春，三女儿因患肺炎，被庸医误诊致死。连失三个女儿，加上日寇侵略中国，受尽凌辱，让张国华和家人历尽苦难，痛不欲生。

1945 年 8 月，日军无条件投降，张国华终于有了出头之日。经友人介绍，先到新浦小学任教，接着又应聘到灌云县立初中任初一班主任，不久又提升为教导主任。1947 年 8 月，又转至母校江苏省立东海师范任普师三班班主任，讲授《教育学》。校长牛云峰发现其才能，即聘其为教务主任。

解放前海州师范政治情况极为复杂，校长牛云峰、总务主任倪爱棠代表国民党势力，中统特务头子袁孟九紧紧抓住训导主任职权，青年教师尹聚伍代表三青团，三股势力牢牢控制学校党政大权，张国华老师游离于三股势力之外，小心谨慎地抓好教务工作和教课业务，受到学生的敬重。

时光进入 1948 年，国民党政治上危机四伏，军事上连连失利，牛云峰校长借口去省厅商讨学校南迁事宜，远去镇江，迟迟不归，临走时宣布张国华为代校长。淮海大战前夕，国民党海属地区党政机关和军队于 11 月 6 日突然决定西撤徐州（实为溃逃），并强令海州师范师生随行。训导主任袁孟九（曾经在解放区任过中学校长，后叛变投敌，并参加中统特务组织）接到命令后，抢先带领 100 多名学生西撤，途经徐州、南京，最后孤身去了台湾。张国华老师带领 100 多名师生第二批西撤，途经沂河大桥队伍即被冲散，到了碾庄，又有几位同学误中飞弹身亡。一路上，张国华老师目睹国民党军政人员腐败无能、争相逃命，根本没有把师生的生命安危放在心上，方知上当受骗。如果继续追随下去，学生的伤亡会更加惨重，经过反复思考，他毅然决定，带领没有失散的 30 多名学生返回母校，投向新中国的怀抱，从此结束了坎坷曲折的前半生。

精心育人　十六年培养学子三千多

1948 年 12 月 19 日，也是新浦、海州解放第 42 天，张国华老师怀着负罪的心情，回到海州古城。未想到海州师范新校长郇华民亲自到校门口迎接张老师一行，并要总务处妥善安排好他们的食宿，这是张国华老师第一次感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温暖。

回校后，张国华老师一再向郇校长表示：当时带领学生西撤，虽是被强制和欺骗，但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有几位同学不幸身亡，还有不少同学流落在外，生死不明，深感痛心，共产党不论怎么处理他都接受，唯一希望是继续留校，给他将功赎罪的机会。

郇华民校长把有关情况调查清楚后，特地到新海连特委汇报，说明张国华老师带领学生西撤是被迫的，对此行的错误认识是深刻的，特别是迷途知返，带领学生重返母校，对海师复课有着良好的推动作用，可以不作处理，继续留校任教。特委书记谷牧表示赞同，要求郇华民校长对张国华老师和所有留用的老教师，一视同仁、热情帮助，让他们在新中国建设中发挥一技之长。

张国华老师听到郇校长转达谷牧书记的表态后，异常兴奋，感激不已，随即要求分配工作，投入紧张的复课建校工作。

开始几个月，学校师资奇缺，仅靠几位留任老教师支撑。经郇华民校长多次向山东省教育厅求援（当时地区建制隶属山东），先后分配张振栋、李经华、刘文华等六位老师来校，后来又从山东师范学院毕业生中分配陆作新、孙玉轩等五六位青年教师，师资情况大为改善。

从山东分配来的几位老教师都是正规大学毕业，有多年教学经验，专业知识相当丰富，语言表达能力也特别强，和留用的几位老师相比，确实有许多高明之处，但张国华老师在广大学生的心目中，还是有较高的威望，究其原因，主要是张老师对待教学工作特别“认真”。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认真备课。开始没有专用课本，张老师自编教材，让教务处刻印成册，分发到每个学生，为学习提供方便。

二是认真教课。张老师是江苏涟水人，加上有些卷舌，讲话不易听懂，为此，张老师语速放慢，课文要点、生字、生词都板板正正地书写在黑板上，再加上善于联系实际，不仅弥补了语言表达能力的不足，还把枯燥的教育学讲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深受学生的欢迎。

三是认真育人。张老师在担任班主任期间，每天从学生起床到晚上熄灯睡觉，都要亲自过问，关怀备至，但要求也特别严格。原上海警备区 85 医院政委邱善华在回忆 39 年前在海师读书情景时，称赞张国华老师在教学上是“殚精竭虑”，在做人上是“堂堂师表”，用行动实现了他所希望的“我爱学生，学生爱我”的崇高理想。

四是认真做好课外辅导。《教育心理学》是师范教育的必修课，是做好人民教师不可或缺的专业技能。当时，同学们不仅注意吃透书本理论，还特别关注实践中可能碰到的难题，同学们经常在课后围着张老师寻求答案，张老师都耐心细致加以解答，直到学生满意为止。

五是认真做好家访。张老师长期担任毕业班的班主任，对学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从不放过。从 1953 年起，由于小学师资紧缺情况缓解，上级允许中师毕业生有一部分人可以报考高等师范院校，为中学培养师资。1956 年夏，张老师发现中师乙班天资聪慧、学习优良的宋宝林同学，因家境贫寒不想继续升学，他就多次和宋宝林同学交谈，劝导她不要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并走访她的家庭，动员她的父母，克服暂时困难，支持女儿继续深造。在做好本人和家庭工作后，张老师又为宋宝林填写志愿书。事后宋宝林考上南京师范学院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徐州师范学院，从助教晋升到教授，先后带领青年教师完成七个科研项目，荣获 1984 ~ 1985 年度科研奖。宋宝林每次谈及往事，都要感激张国华老师对她的帮助，如果没有张老师的劝导和关爱，她不可能走进高校的讲堂，更不可能在化学专业上取得许多科研成就。

六是认真整理教学资料。张老师在尽心尽力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还不忘整理教材和教学资料，先后写出《教育学讲义》两册，《教育实习题集》两册，《毕业生工作后调查研究》两册，这些珍贵资料，为后人提供参考，其中教育学讲义还被其他学校作为教学参考书。

据介绍，张国华老师解放后在海师直接教授的学生有 3700 多人，他们大都奋战在苏北、鲁南一带，成为中小学乃至高校的中坚人才。

张国华老师在海师 16 年，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尽心尽力协助教导处工作多年。郇校长熟知张老师解放前曾两次担任教务主任，对教务工作经验丰富，所以委托张老师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抽出时间协助教导处做些具体工作，如新学期课程安排，各科试卷题审查，教研组活动计划等等。由于张老师业务娴熟，处理起来得心应手，很受老师们欢迎。

二是关心政治学习。解放初期，海师政治空气特别浓厚，党支部、青年团活动，都是利用星期日早上进行，从不占用工作和上课时间。张国华、张振栋老师也仿效党团组织，带动十几位老教师，自掏腰包，购买《论党》、《论共产党员修养》、《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书籍，每到星期天早上，黎明即起身，大家自动到校长室二楼，围着乒乓球桌，认真读书，联系思想，展开讨论，风雨无阻，连续数载，受到广大师生赞扬。有一次市委领导来校作形势报告，听到这个情况后，赞许地说：海师老教师学习政治的热情比我们机关干部还高啊！

张国华老师为人正直、工作勤奋、治学严谨、师德高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多次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1955 年 7 月，作为江苏省 10 名先进工作者，被邀请到江苏太湖疗养；1958 年 7 月，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60 年 4 月，被评为连云港市模范教师；1964 年 12 月，又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晚年逢盛世　长眠校园了却一生情

1965 年 1 月，张国华老师在海州师范退休后，被儿子张立人接到徐州定居，过着幸福的晚年。张立人同志曾在连云中学就读，解放后考取新海连特区创办的建国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市总工会工作，后调徐州大众报社，最后在《徐州日报》副总编、淮海经济新闻报社社长岗位上离休。

张国华老师退休后，先后遇上三件喜事：一是

重新审定历史结论。文革中工宣队受左的思想影响，把张老师早期参加国民党一事作为“重大”历史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排除左的干扰，连云港市文教部门决定去掉“重大”二字，作为一般历史问题看待，并派专人到徐州向张老师当面宣布；二是 1984 年 2 月经组织研究，决定张国华老师由“退休”改为“离休”，享受县处级政治生活待遇；三是 1989 年重阳节，由全国妇联、《中国妇女报》等四家单位联合发起的评选“金婚伴侣”活动，张国华和老伴曾理荣获“全国伴侣证书”和“金婚纪念奖”。

这一切让张老师的晚年生活更加美满，更加幸福，也让张国华老师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由此也孕育着一个惊人的理想。争取参加中国共产党。他说：我们一家（指成年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也要争取参加共产党。事后他多次向党组织申请，不顾年老体迈，到区里听党课。1991 年秋，中共徐州市委云龙区委组织部拍摄的党建工作电视专题片中，特地录下了他参加党课学习的镜头。根据他的请求组织对他进行了考察，云龙区王陵办事处党支部一致同意他申请入党的要求。张国华老师虽然最后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我们相信，他听到党支部的决议后也会得到安慰和鼓舞。

张国华老师离休后，虽然人在徐州，但心还是留在母校，不时挂念海师的发展。在应邀参加海师 64 届校友聚会时，向海师副校长孙玉轩提出举办 70 周年校庆的建议。张国华老师的建议，很快得到海师全体校领导的赞同，庆祝建校 70 周年的筹备工作也随之拉开帷幕。张国华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万分，加班加点撰写有关资料迎接校庆。经过一年多的呕心沥血，先后写出“先师吴铁秋先生二三事”；“抗战胜利后的海州师范”；“解放后海师三位抓教学的副校长”；“海州师范校史纪要”；“1984 年返校纪行”等 9 篇重要资料。特别令人钦佩的是，张国华老师经过广泛搜集整理，写出“海州师范在徐属的校友”文稿，用 4000 多字，详细介绍了徐州师范学院（现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宋宝林、副教授王庆生、讲师汪福天、运河师范校长袁道传、铜山茅村中学语文教研组长于怀选、碾庄中学校长魏高哲等 11 位校友的工作情况和骄人的业绩，充分展示了海州师范在发展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文稿在校庆交流时，受到广大师生和新老校友的好评，并被海师图书馆作为珍贵资料予以长期保存。

校庆归来后，张老师又赶写了“参加海师七十周年校庆前后”文稿，他在文中坦言，“校庆归来，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从学校到社会，对我都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深深感到：尊师重教、尊老爱幼，已逐步形成社会风尚。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做中国人民中的一名老教师，真是无比幸福，我誓愿在有生之年，为海师的发展，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真正做到老而不僵！”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张国华老师不遗余力奉献余热时，体检时查出癌症，并于 1992 年 2 月 11 日与世长辞。临终前，他一再嘱咐子女，丧事从简，骨灰一分为三，一份送回涟水老家，一份留在徐州云龙山，一份撒在海师校园，以表达对母校的依恋之情。

为了实现老父的遗愿，张立人同志向时任海州师范宋健民校长正式提出申请。海州师范建校近 80 年，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但考虑到张老师一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在海师工作达 16 年之久，为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退休后还不时关心海师的发展，受到全校师生的敬重，决定破例批准这个请求。

1992 年 2 月下旬的一天，张立人、周建芝夫妇捧着张老师的骨灰盒，乘火车来到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的海师校园，我和连云港日报总编陈天柱同志应宋校长之约，陪同参加了这个庄严肃穆、也是空前绝后的骨灰撒放仪式。虽然仪式很简朴，但却让我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民教师的真实情景！

张老师的最后一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他那颗爱国、爱党、爱校、爱学生的红心，将滋润着海师校园的一草一木，滋润着年轻一代茁壮成长。

（作者单位：市委统战部）

责任编辑 邱仕明

彦涵在东海师范的求学经历

刘　阳

彦涵在东海师范求学留影

在过去，只要提及彦涵先生的求学历程，往往是从1935年他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开始的，但对1935年之前，彦涵先生在东海师范初中部3年的求学历程却知之甚少。建校于1914年的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经过100年的发展，将于2014年迎来百年校庆。为迎接这一盛事，连云港师专组织人力，走访了一批已离退休的海州师范老领导和老校友。2007年冬，笔者有幸采访到一位毕业于1936年的老校友许惠来同志，从他那里了解到一些彦涵先生不为人知的求学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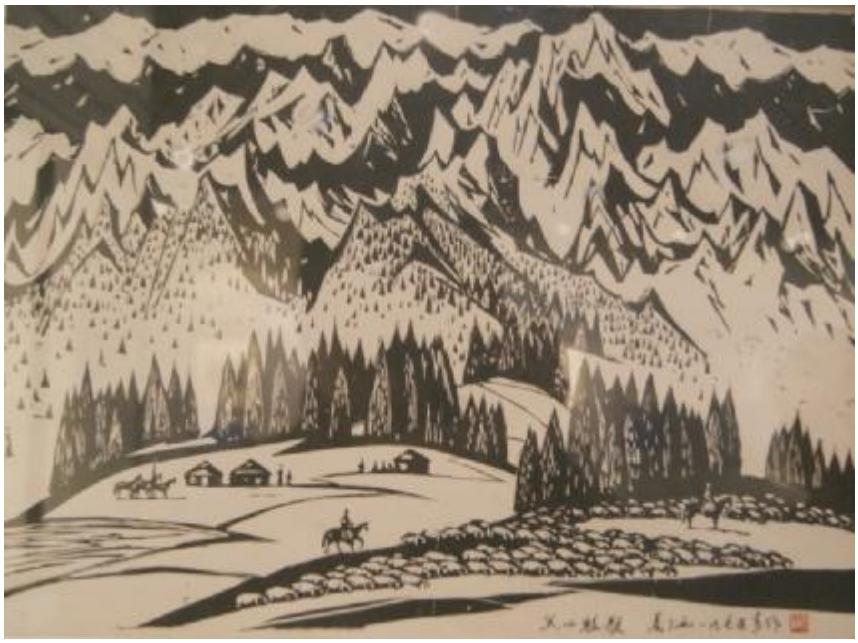
彦涵先生原名刘宝森，1916年7月23日出生在东海富安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彦涵自幼随父亲辗转来到新浦，来到这个亟待开发的新兴商业小镇。1928年，彦涵考进了普爱小学。1932年，读完高小全部课程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江苏省东海师范学校初中部，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初中生活。

据许惠来老人回忆，1933年春，他从家乡满怀着对求知的渴望来到海州，来到这所堪称海属地区的最高学府。当时能够在这里念书的都是周边地区学生中佼佼者，许老说到这里，他脸上不禁泛出一丝得意的神情。当时的初中部位于今天海州高级中学东侧一个旧称“考棚”的地方，四周围以石质高墙，校门直冲巍峨的锦屏山。入学的当天，时任东海师范校长、著名的爱国教育家曹中权先生在新建的校图书馆礼堂为新生发表入学演讲，他的演讲结束后，紧接着便是学生代表发言，第二个上台就是彦涵（注：当时叫刘宝森），由于时隔几十年，许老对于当时的讲话内容已记不清了，但对于时任“霞光画社”大组长的刘宝森却记忆犹新。

许惠来老人在校期间，也曾是“霞光画社”的成员之一，“霞光画社”的创始人是该校的美术老师，上海美院的高材生，时年41岁的如皋人王秉衡先生。“霞光画社”设水墨、素描、工笔、油彩四个大组，下设若干小组，刘宝森兼素描、油彩两个大组的组长，是王秉衡老师的得力助手。每逢学校需要搞宣传活动时，刘宝森总是冲在最前面，曾多次受到王老师的公开褒奖。

提及往事，许老如数家珍：“记得那是1933年初夏的一天，学校组织部分学生前往位于南门外的

双龙井抬水，一来可以缓解学校近日用水紧张的窘境，二来也为锻炼学生的意志。我与刘宝森分在一个组，公用一条扁担。由于我在家中排行老小，家中姐姐平日里都让着我，对于抬水这类的体力活，只能是勉强应付。刘宝森得知我的情况后，并没有嘲笑于我，在前往双龙井的路上，那只十余斤重的木桶都是由他拿着的，而我只负责扛着空扁担。这一切都被站在井边的曹校长看在眼里，正当我们准备将打好的水往回抬时，曹校长上前询问情况，刘宝森不但为我讲情，还在曹校长面前夸我在学习上如何用功，并说明了情况，得到了曹校长的谅解。”



1975 年彦涵创作的版画《天山放歌》

刘宝森家境贫寒，在校期间的学杂费用往往要到学期结束前才勉强交齐，校方曾多次催缴，并扬言将他赶出校门。当时，教授我们国文的老师是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张松年先生（即张荣尧），他是新县（今朝阳镇）乡绅张学翰的独子，与校教务主任胡雪松关系莫逆，在学校里很有头面。他曾多次与刘宝森单独交流，传授了他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刘宝森也经常在同学间相互传抄共产主义的宣传册，因此张松年对他十分的赏识，曾多次出面为刘宝森作担保，并用自己的薪水为他缴纳学杂费。

刘宝森入学的前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紧接着的 1932 年，淞沪会战爆发，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打出“抵制日货，救我中华”的口号。深受早期共产主义熏陶的刘宝森在张松年的带领下，在校内张贴宣传标语，激励同学奋勇抗争，并手绘宣传漫画，在同学中广为传阅。

1935 年 5 月 3 日，时任国民政府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来东海师范视察，校务处要求全体学生统一着装在车站迎接。刘宝森目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对现实极为不满。他组织了几名要好的进步学生，身着颜色艳丽的便装站在队伍中，以示抗议。反动当局、东海专员郝国玺，县长何振纲在车站当即向校长曹中权施压，要求开除以刘宝森为首的反抗学生。校务主任张松年凭借与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的私人关系，力保刘宝森等四名学生，并与曹中权商议，为保护学生，给刘宝森等人私下颁发了毕业证书，并准其提前离校。后在张的悉心辅导下，刘宝森投考了杭州艺术专修学校，开始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美术事业。

“1936 年夏，我从东海师范初中部顺利毕业。自打刘宝森离开学校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他。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在苏州大学图书馆翻阅一本叫《彦涵木刻选》的画册时才知道，原来彦涵就是原来的刘宝森，是我那在东海师范可亲可敬的大学长。如果能在有生之年与他再见上一面，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他在学校时对我的关怀和帮助！”许老深情地说。

2011 年 9 月 26 日晚，著名艺术教育家、版画家，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设计者之一彦涵在北京逝世，享年 95 岁。

（作者单位：市重点文物保护研究所）

责任编辑　邱仕明

赣榆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祝新华

赣榆县是苏北鲁南著名的革命老区，其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对该县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好局面，意义十分重大。为此，本文拟就赣榆县最早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及其作用等，与诸君一道走进那段艰苦卓绝而又光辉灿烂的历史岁月。

爱国县长以身殉职　赣榆军政陷入瘫痪

赣榆县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赣榆县党支部于 1928 年 2 月成立，但年底就被破坏。1929 年底在东海县党组织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共赣榆县总支部，1930 年 4 月又遭破坏。直到 1938 年 6 月下旬 57 军 112 师地下党组织帮助赣榆建立了中共赣榆县特别支部。1938 年 12 月，赣榆特支被撤销，成立中共赣榆党团。1939 年 1 月，改为中共赣榆县工作委员会。1938 年 1 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任命朱爱周担任赣榆县长。朱爱周到任后，整顿了县政机关，重建了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并坚持国共合作，拥护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一致抗日，很快形成了赣榆县抗战初期各阶层团结抗战的大好局面。可好景不长，1940 年 3 月 22 日凌晨，日寇由碑廓村向朱爱周县府和常备旅驻地韦家岭偷袭，抗日县长朱爱周以身殉国，赣榆军政机构陷入瘫痪状态。

顽固政府反共反人民　八路军予以坚决反击

朱爱周牺牲后，针对重新陷入瘫痪的赣榆无政府状态，3 月底，赣榆各界代表和军政领导人员在大赤涧村开会，商讨县政事宜，建议民选县长，以利守土抗战。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宋少峰、蒋亦良、徐达人等人的控告、阻挠，赣榆民选县长的方案未能实现。4 月中旬，江苏省政府委任反共的董毓珮为赣榆县长。董毓珮是个极端反动的人物，上任后即排斥、杀害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他一方面肆意制造白色恐怖，残害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人民群众，另一方面则勾结日伪，共同反共。从此，赣榆团结抗日的局面，被董顽一手破坏。

针对倒行逆施的董毓珮县府，于 1940 年 7 月 7 日从赣榆撤到莒南县北甘霖村的中共赣榆工委机关成立了自己的人民武装——临郯赣东边区游击支队。“边支”一方面加紧对董顽内部进行政治瓦解工作，另一方面则积极配合东进支队主力进军赣榆地区，以试探性的进攻，促使顽军内部分化。1940 年 8 月 13 日，我八路军东进支队二大队进入赣榆，袭击三角汪、马朱孟董顽驻军。8 月 18 日，我八路军东进支队一大队进攻庄王堂之顽军。两次战斗，虽然规模不大，却加剧了董顽内部的矛盾，致使赣榆反董倾向日渐明显，“董顽下台，挽救赣榆”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民主政府宣告成立　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

从 1940 年 11 月中旬开始，山纵二旅一部和“边支”联合参战，打响攻取赣榆的战斗，迫使董毓珮率部队与政府官员向南逃窜，赣榆西部、北部山区全部解放。11 月 30 日，山纵二旅政治部负责人代表八路军在王接庄村宣布，赣榆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隶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莒日临赣

四县联合办事处，办事处主任谢辉、副主任崔介。民主人士朱明远任县长，共产党员李克济任秘书兼县府党组书记。县政府下设两个科，一科科长李克济，二科科长徐尧卿。自此，赣榆县有了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赣榆县抗日民主政府。之后，县政府迁至八区的探马村开展县政工作，并成立了优抚委员会和春耕委员会。

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请求山纵二旅刘涌团和独立团于 1941 年 1 月 4 日，对董顽保安旅发起总攻。经一昼夜激战，董毓珮被击毙，国民党流亡政府逃至海赣边沿区苟延残喘，赣榆西部、北部的四、五、六、八区获得解放，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同年，抗日民主政府重新设置财粮、武装、公安科（局）。1941 年 6 月，各区召开各界人士代表会，选举参议员。7 月，赣榆县第一届参议员大会在五区半路村召开，出席会议的参议员共 91 人。其中，地主 8 人、富农 10 人、中农 30 人、贫农 35 人、雇农 8 人。会议历时 3 天，朱明远当选为赣榆首任县长，徐子真当选为赣榆县第一届参议会参议长。会议作出了改善工人生活、实行合理负担、优待抗属、统一税收、建立抗日小学、提高妇女文化水平等决议案，颁布了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

赣榆县第一届参议会后，各区参议会通过传达县参议会的决议，把各阶层人士团结到抗日救国的道路上来。参议会的召开，促进了群众民主思想的高涨，改善了政权机关工作作风。参议员成为赣榆县党和政府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敌的纽带。

民主政权逐步完善　全民抗日热情日趋高涨

赣榆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行政区划沿用旧制，全县仍为八个区。其中 1940 年控制地建立了 4 个区公所。第四区区长古吉三，第五区区长辛明，第六区区长孙德南，第八区区长张伯扬。并迅速组织 17 个乡陆续建立政权。乡政委员会由 7 人组成，成员多系上层人物，乡长由区公所委派。乡政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筹集公粮，组织担架，支援战争。条件较好的乡还建立了三四十人的乡分队，由部队派去政治指导员一人，掌握武装。之后，还新建村政权 300 多个，每村设临时村长一人，负责筹粮派夫。

1941 年底，乡政权撤销实行小区制，全县划为 12 个区：芦阳区长熊日东、兴海区长孙德南、金山区长李仲才、吴山区长王润一、徐山区长徐德三、门河区长王津海、谷阳区长徐慕韩、朱孟区长陈中瑞、镇南区长柏斗繁、朝阳区长乔家颖、清河区长陈云鼎、玉河区长孙麟甫。解放区面积 3500 平方公里，人口 229500 人；边沿区面积 900 平方公里，人口 86190 人；敌占区面积 2600 平方公里，人口 134310 人。

1942 年，县政府改为设置 10 个科（局）：秘书科长刘慕文、民政科长刘慕文（兼）、财政科长李仲铭、粮秣科长张级、经建科长于子厚、司法科长（副）佟苏、文教科长张伯扬、公安局长王彬、战时邮局局长李浩然、武装科长辛明。为了更好地开展边沿区工作，县政府还增设了赣南办事处，徐子真任主任，阎伯烈为副主任，主要任务是争取瓦解伪军，建立伪军中的点线关系，进行隐蔽的对敌斗争。

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实行“三三制”——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共产党员、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进步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中开明绅士的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大体各占三分之一的一种民主制度。并切实地执行我党的各项政策，给人民以抗战、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团结各阶层人士，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县人民在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战守土、民主建设的高潮。

1995 年 6 月 26 日，中共赣榆县委、县人民政府将“赣榆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纪念地”定为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单位：赣榆县党史县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邱仕明

赣榆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地旧址

八路军 115 师司令部旧址纪念馆效果图

八路军 115 师司令部旧址

本刊编辑部

八路军 115 师司令部旧址位于苏鲁边界的东海县南辰乡西朱范村。1942 年 4 月至 7 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赴延安参加七大会议途中，在西朱范村检查指导山东工作。当时的西朱范村是八路军 115 师师部、中共山东分局所在地，是当时山东党政军的领导机关驻地，也成为伟人刘少奇山东之行的主要工作、生活之地。

刘少奇同志在西朱范村先后召开了山东党政军主要领导扩大会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统一了山东党政军干部的思想，彻底扭转了山东的被动工作局面。从此，山东党政军拨正了航向，由此乘胜前进，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为了让这段峥嵘岁月永垂青史，让老区革命精神继往开来，代代相传，东海县南辰乡党委计划筹建八路军 115 师司令部旧址纪念馆，使之成为苏鲁两省边界的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连云港市治水碑(一)

张卫怀

仅就“治水”而言,连云港市见之于文字记载和实物的碑记有 9 篇。其中明朝嘉靖二十四年(1545 年)疏浚蔷薇河碑文 3 篇,见于《隆庆海州志》;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赣榆县治理大石桥河、玉带河后,举人董志毅撰写的《三公河记》碑文,见于其子董杏于崇祯十三年(1640 年)所编的《赣榆县续志》和后来的《光绪赣榆县志》;清嘉庆十五年(1810 年)赣榆县知县陈鸿寿治水碑,在赣榆县罗阳镇艾塘公园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修浚赣邑河渠堤坝碑》,在赣榆县宋庄范店村北的南北路东旁;民国 8 年(1919 年)赣榆县知事王佐良整修金蟹泉碑,现存赣榆县赣马高级中学;民国 36 年(1947 年)张振汉立的浚云河碑现存云台乡政府院内;以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名义立的石梁河水库除险加固碑,镶嵌在石梁河水库“安澜”雕塑上。现以时序分别简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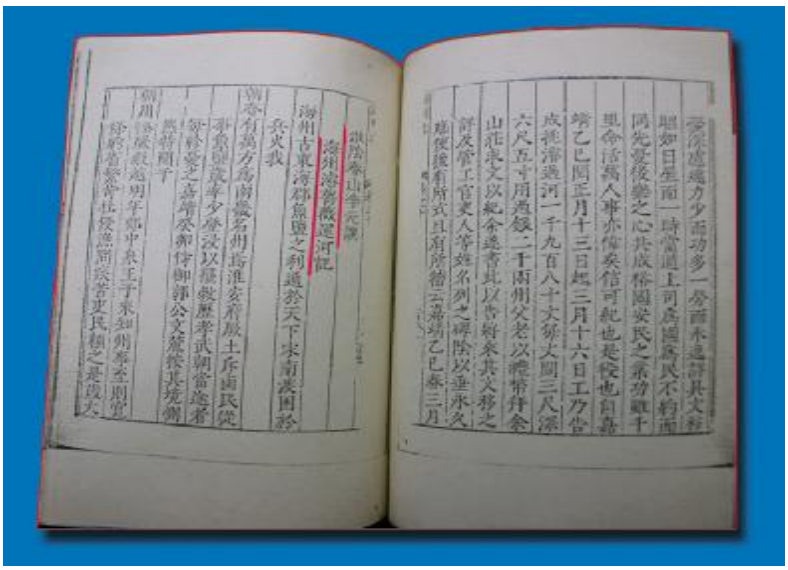
一、海州疏浚蔷薇河碑文

现在的蔷薇河从东海友谊河口至临洪闸全长 50.7 公里,流域面积 1365 平方公里,是我市重要的防洪、排涝、灌溉河道,也是我市市区重要防洪屏障。在古代,我市是黄淮沭沂泗诸河的入海通道,蔷薇河承担着主要的洪水下泄任务。明弘治八年(1495 年),黄河在黄陵冈等处决口,明廷大筑黄河北堤为屏障,致使黄河主流南下,使得黄河、淮河合流,淮沂沭泗尾闾尽遭淤塞,蔷薇河亦遭严重淤塞,海州地区水灾连年发生。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王同知海州。嘉靖二十四年(1545 年),王同用“以工代赈”的方法,招募饥民 2440 人,从正月十三开工,到三月十六竣工,疏浚蔷薇河 1980 丈,在蔷薇河入海口修筑 5 道挡潮堤坝。工程完竣后,留下了淮阴李元、沭阳仲选和王同的 3 篇碑文。

李元的碑文《重修蔷薇河记》为:士君子,才抱经济,身际明时,存先忧后乐之心,宏裕国安民之业,必同心协谋,乃克有济。虽云一政之善,而全政之善可占也已。淮安府属海州,旧有蔷薇河在西门外三里余,年久淤塞,不能接入新坝涟河以达淮泗。用致商人盐船自海冒险,又且顾觅牛车,拉至海崖上船,经年守装,劳费万状。该商灶人等告州,转达挑浚便民等情。本州知州王君同谓:“通此河,商灶俱便。”事干盐法,适遇荒歉,财力孔艰,藉次修理之策,隐寓赈济之意。乃申呈巡盐侍御齐公云汀。公乃于抚院王公克斋、巡按郭公文麓相会,咸以该州久敝民困,百计处分挑河一事,本院当处。累经呈请,随批会议,酌量审处,既不病商,又不病灶,用财而不取商财,用民而因赈民,革弊防奸,忧深虑远,力少而功多,一劳而永逸。详具文移,昭如日星。而一时当道上司,为国为民,不约而同,先忧后乐之心,共成裕国安民之业。功虽千里,命活万人,事亦伟矣,信可纪也。是役也,自嘉靖乙巳正月十三日起,三月十六日工乃告成,挑浚过河一千九百八十丈,每丈阔三尺,深六尺五寸,用过银二千两。州父老以礼币拜余山庄,求文以纪。余遂书此以告将来,其文移之详及管工官吏人等姓名列之碑阴,以垂永久。庶使后有所式,且有所稽云。嘉靖乙巳春三月,淮阴春山李元撰。

李元为淮阴人,赐进士出身,亚中大夫,是蔡昂的妻舅,曾任监察御史、山西布政司参政。

沭阳万山人仲选撰写了《海州浚蔷薇运河记》,其文曰:海州,古东海郡。鱼盐



《隆庆海州志》载淮阴李元的《重修蔷薇河记》，
沭阳仲选的《海州浚蔷薇运河记》

之利，通于天下。宋南渡困于兵火，我朝奄有万方为南畿名州焉。淮安府厥土斥卤，民从事鱼盐，岁率少登，浸以罢敝。历孝武朝（孝宗弘治、武宗正德），当途者每轸忧之。嘉靖癸卯（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侍御郭公文麓按其境，恻然特闻于朝，用拯厥敝。越明年，郧中泉王子来知州事，至则宽条约、省繁苛、杜侵渔、问疾苦，吏民赖之。是岁大饥，巡抚大中丞克斋王公、巡按侍御环峰贾公，恻昭民艰，加意抚恤，减兑军银四千两，复遣府倅、池屿唐公赍公帑银五千两，公自赈给，民获以安。先是城西有河曰蔷薇，源羽山，带涟水，且海潮相通，延十余里，盐商舟楫，往来必经。自成化间，水壅不疏者五十余年。商人困于陆，辕民亦无赖。先牧守常议疏沧不果。至是王子援宋文正公守杭故事，假以济民，恳于侍御。云汀齐公实督理盐政，专厥事嘉，乃谋檄府议之，太守、泽山姚公协谋。允同以赃罚银二千两浚蔷薇河十余里，以盐商积引余银五千六百两浚河运一百四十余里。二守、南浒解公综理，发州募民挑浚，州佐严子、许子分督。因赈，饥民闻之，牵臂荷锸，日数千人，欢呼赴事，不两月而功成。潮汐如故，舟楫复行。活者数千人，咸沾云汀公之惠。王子遗书万山仲子曰："古人有立功德于民者，民诵之、史载之，传之不朽。云汀公活我海民，其德莫大焉。"欲饶诸珉以志海民之思。子其图之。选曰："不亦善乎，云汀公之德之感也，今夫人之举事，或行之非其时则劳，或处之非其道则废。苟时有道矣，而任之非其人，则枘凿不投，眩名失实，欲成其事不可得也，矧责效济民于饥馑之间乎？"余谓云汀公蔷薇之役有三善焉：因人之利而利之，惠而不费，仁也；乘可为之时为之，劳而不怨，智也；又得同志之人奉以周旋，以成厥功，靖共尔位，好是懿德，忠也。君子之德莫大于是！宜乎，海民之诵之也。昔者，公孙侨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夫子谓之遗爱。彼直郑国之政，其视南畿犹什一也，春秋大书特书，不一而足，传至于今不衰。以是知云汀公之爱，其遗也，亦既多矣。《诗》曰："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云汀公有焉。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吾于诸公诵之，谨撰其事以俟夫志河渠、传循吏者。嘉靖乙巳三月，沭阳万山仲选撰。

仲选，字思舜，仲敏的后裔，沭阳万山人。明正德丙子年（1516年）举人，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已辛科进士及第，授云南道监察御史。为人方正，嫉恶如仇。嘉靖年间曾上书《陈言消变疏》，建议皇帝敦圣学、揽政权、远小人、励百官、录忠直、苏民困、振武备，皆切中时弊。后升任武昌知府，政见与楚藩相左，遂被罢官，下汉阳狱。后冤狱平反，出任莱州知府。明征安南，任云南兵备副使，领兵征战。战事平息后，因在莱州任上曾阻开胶莱河而得罪上司，被弹劾丢官。仲选回归故里，足不履郡县，但抚恤乡人。

以上两篇碑文是在蔷薇河疏浚完成之后的三月撰写的。到年底，知州王同又亲自撰写了一篇《海州蔷薇河纪成碑》文，碑文为：

海州面山滨海，控齐鲁，蔽江淮，高丽直东，渺茫无际。秦为东门，诚边冲咽喉。自汉唐洎我朝以来，名弘江左，灵毓朐山。频年孽蝗相仍，赋役特重，流移日甚，上下俱困。堂堂州治如入无人之境，在在良田尽为荒草之区。不惟村舍萧索，虽城市亦鲜人踪可以驰驱。凡贸易肆物，必赴邻近而后可得。吁！

何以大异于昔哉?惟州西河曰蔷薇,东接大海,西入涟河,蔷薇襟带其中,众流萦纡回洊,以达淮泗。自弘治己酉淤塞,南北间断,盐运转海,风波守装,劳费万状。旧拟挑浚,工计一千九百八十寻,议银一两一钱,计银二千一百八十一两。屡议屡止,遑延于今五十一年矣。为嘉靖甲辰,同以菲才奉乏于兹,时荐饥馑,老稚枵腹,闭门待毙,忧惧如焚,乃以此河请于察院齐公云汀。公巡按盐法,洞照民瘼,详示该州之累,不待申请而知,日夜关心。本州具申者数,公则察之以恕,藻鉴止水,确乎莫挠也。龃司阻行者数,公则承之以毅,飚激雷厉,烈乎莫移也。饥民以给者万,公则终之以惠,春风化雨,勃乎莫遏也。公非在上,曷有是举?自兴是役也,四外贩者始趋于市,四野殍者得免于途,日吞草食者始得谷而食矣。经始于乙巳闰正月十三日。海口为堤者五,以障潮汐。择其能者督凡五十人,人力者募凡二千四百四十人。省试者勤工作凡四十四日,银减其奇数给凡二千两。如旧拟每工袤一寻,阔视袤加二倍,深半之。及浚运河一万三千四百七十四寻,每巡深阔有差,又给银五千两有奇。落成于季春既望。民罔知扰,役罔知劳,工罔废程。自今以往,不惟盐利载兴,虽士于庠者亦得所养而尽心肄业。诸货可致,百工有易,千艘飞帆,万旅相通,四境腾欢,久湮之迹赖以再兴,垂死之民得以更生,已为之郡期以复振。若非我公恻时艰苦,举斯以赈,则民生且不存矣!而况永利于后乎?即天时雨潦,漂泊其堤,人力参差作辍,其功成之愆期,亦负兹盛举矣。公之成是,意更有在:盖民饥则盗,盗起则扰;饥者饲之,潜消于预。事窒则敝,敝久则弛;窒者通之,振举于上。故德泽洽而风纪之化张矣。因纪斯成,以管窥公之大政。愧同琐才靡尽,谨括略始末,缀之以告。嘉靖二十有四年孟冬望日,海州知州王同撰。

王同,字一之,河南郏县举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 任海州知州。时海州岁荒民困,百姓原 12700 余户,逃亡仅存 3500 余户,官民田地 11460 余顷,有收成的仅 1500 余顷。王同即上书朝廷力陈百姓不堪赋役之苦,得准减轻赋税。他招抚逃亡流民,开垦荒地,合并乡里,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民气复苏。在任上,王同还率民疏通河道,修整学宫,救荒赈灾,实政惠民。王同工书法,常为民间书写匾额碑记,在孔望山和石棚山留下“归云飞鸟”、“高行清风”等石刻。后升任南京都督府。

此后 60 多年,海州地区仍是重水灾区,封建王朝和地方官吏等也时有治水之举,如,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知州高瑶征工 1.88 万人挑浚大伊山至板浦碑亭官河;隆庆六年(1572 年)知州郑复亨建托山庙闸;万历元年(1573 年)徽商程继敬重修万金坝;万历十三年(1585 年)州判唐伯元筑大村堰;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知州杨凤疏浚官河。但都没有刻碑记事的记载,也没发现实物。

(作者单位:市水利局)

责任编辑　邱仕明

石棚山王同书“高行清风”石刻

小塔山水库雄姿

小塔山水库的前世今生

葛均坡

小塔山水库位于赣榆县西北部，青口河中游。她西依沂蒙余脉，北濒赣榆最高峰大吴山。

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享受着新天地的幸福自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更激励着人民的创造精神，政府和人民注重兴修水利。专家和地方领导踏勘小塔山盆域，这里三面环山，唯向东为开阔之地。无疑，这里是建设水库的好址。但在规划之时，却也颇有争议。盆地有上万亩土地，还有古寺，加之水面上延又将波及几千亩的土地。人们不愿让这广袤的土地和古老的寺宇淹入水库。虽有反对的声音，最终人们还是以大局为重。自 1958 年 10 月，小塔山水库建设正式开工。当地民众 3.5 万人，以公社为单位组成战斗兵团，凭着“人定胜天”的豪气，民工们吃着杂粮窝饼，推着独轮车昼夜不停地奔跑，硬是在山窝的东向口筑起大坝，锁住三方来水，建成一座人工水库，于 1959 年 9 月竣工。时计国家投资 1367 万元，地方投工 927 万工日。库区淹没土地 29000 亩，拆迁房屋 13464 间，移民 15813 人。如在库区上游的董康邑村，不得不整体搬迁上移至丘岭地带安住，一分为二为南康邑村和北康邑村，有的村部分或全部远迁他乡。水库集水面积 386 平方千米，总库容 2.8 亿立方米，兴利水位 32.8 米，兴利库容 1.16 亿立方米，是以防洪为主，结合灌溉、城镇供水等综合利用的大(2)型水库，跻身省内第二大水库，自 1980 年开始向赣榆县城供水。水库以山为名，称为“小塔山水库”。有识之士从发展旅游层面着想，美其名“塔山湖”。

水库位于小塔山与子贡山之间，库区人文景观众多，历史底蕴深厚。“小塔山水库”库名碑刻由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书法大师舒同题写。小塔山

位于主坝东端，面积 1.07 平方公里，峰高 69.5 米。主坝西端有“子贡山”，旧名万松山，峰高 47.7 米。现存子贡晒书台、端木书院遗址，明清时期列“赣榆八景”之首。相传，孔子门生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奉师命赴吴“止吴霸越，乱齐存鲁”，不辱使命。归经万松山，被秀丽风光所吸引，流连忘返。不料暴雨骤至，所携书籍尽湿。待雨过天晴，见山上有一巨石，便将湿书摊晒其上，不久即干。后世文人学子慕巨石文气，皆来叩拜。官府有感于此，乃建端木祠堂，延聘端木后裔，奉祀香火，并免徭赋，将山更名为“子贡山”，晒书的巨石被称作“端木书台”。其后，游人纷至，风光日盛。

多少年来，地方政府和人民对水库呵护有加，不断进行改造加固，美化亮化，使她始终健康丰润。库区地处暖温带湿润季风区，生物群落类型多样，主要有水生生物群落、湿地生物群落和陆生生物群落类型。生物类群在长期的生长、繁殖和演化过程中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各自盘踞着一方空间，构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和稳定的生物群落。友好的环境空间也招来了很多珍稀兽类和禽类。

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富足的人们又开发着她新的价值。这里碧波浩瀚，加之山川灵气，实是游览胜地！1987 年，子贡山上新建一六角双层塔亭。2002 年 10 月，国家投资 1.07 亿元对水库实行除险加固，工程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主题，现代水利工程技术与库区自然景观、人文古迹相得益彰。当地以水库为依托，在保护库区生态环境的根基下不断进行适度开发，景区旅游及配套设施日臻完善，先后完成道路、观景台、楼阁、围栏等基础设施，建成宾馆、餐厅、运动健身中心和靶场等，小塔山景观区、子贡山山庄休闲区、坝下农业田园风光区和别墅度假区粗具规模，成为观光旅游、觅踪怀古、休闲度假的好去处。2007 年，库区被省水利厅批复为第一批“省级水利风景区”，2010 年荣膺国家水利风景区，被誉为赣榆“后花园”。景区内有 242 省道，与徐夹、厉大等干道相接。景区中有长 4.5 千米，宽 7 米的坝顶道路全线贯通，铺设了青石板道路 10000 平方米。在小塔山和子贡山分别设有若干停车泊位，主坝两端设有 2 个游览码头。

为建设小塔山水库，赣榆人民付出了极大代价，党和政府始终记着那个历史年代的人们。过去的那几十年，移民或许是带有某种程度敏感的话题。随着国家的富强和社会法制文明的进步，各级政府开始对当年的移民给予生活补助，虽资金不多，也可少许安慰那些已近晚年的人们。

50 余年来，小塔山水库默默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使地方人民受益匪浅。小塔山水库是一面镜子，她印证了党和政府着力于人民的福祉，与人民风雨与共的历程。

（作者单位：赣榆县党史县志工作办公室）

责任编辑　邱仕明

子贡山端木书台遗址

风光秀美的大伊山

大伊山古桥寻踪

吴唐基

大伊山受淮沭沂诸水之侵，沟河纵横，漕运粮盐的古盐河穿城而过，山川倒映，碧水环绕，一派江南小桥流水景象。据老人回忆，仅在城区范围内就有 18 座古桥、5 个古渡口。古桥大多为石梁桥，如今尚遗存的桥名只有 13 座，其有大石桥、虹桥、漩桥、马奶桥、金跳、任小桥、烧香桥、黄桥、土老桥、天齐桥、月牙桥、三步两桥、一马上殿桥，西门大石桥和街北的虹桥、街南的漩桥这三座古桥较闻名。

西门大石桥始建于清，咸丰九年(1859 年)建在西城门护城河上，由大伊山首富王二老爷所建。桥长十三丈、宽两丈二，七孔由七十七块条石铺成，桥基打入梅花桩，为防土匪，桥中央用活板，晚收早放，由殷小丁老人看管，石桥建成名闻江淮。百姓为牢记他济世渡人的功德，口传一句民谣曰：“王为桓造大桥，万古千秋”，并把他家门前古巷称叫二佬巷。1953 年，灌云县政府派小伊乡名匠杜恒如领工翻建石桥，更名“伊山拱桥”。那时节，桥下河水清澈见底，渔船来往于河面，石码头上取水、洗菜的人们十分繁忙，人与自然呈现出一派和谐景象。

虹桥建于镇北盐河口河汊上，古河叉名叫北头垛，又叫虹桥头。虹桥由南北向和东西向两道石桥组成，两桥相隔五十米，分别有十二块长两丈、宽二尺的条石铺成，明清之际虹桥是街北非常兴旺的水陆码头。虹桥对岸叫鸡心垛，是船民的聚居地。每年二月初二，河口有规模很大的土地庙会，耍龙灯、玩马戏、唱大洋片的应有尽有，热闹非凡。桥东有王姓同和公、马姓长丰泰、聚和等六家粮行，五家草行，平家棺材铺；桥北有金家客栈、茆家饭店；桥头有吴宝玉小虹楼桂花汤元、虾仁馄饨、贺四麻捆蹄、李郎头粉团等名吃。夜晚，船粮所归，货盐所聚，岸边人

头攒动，马灯、汽油灯通亮，石桥倒影如彩虹一般。

漩桥，古称青龙桥，桥址在中大街街南，桥面高出街心 2 米，由 8 块长 6 米、宽 0.5 米的条石铺成，两旁斜坡设有铁栏杆 16 根，柱端设托盘。晚上可摆放马灯，供车船夜间行驶照明用。清末贼寇四起，经常有血人头悬挂于此。

漩桥桥名有诸说，古勘舆学称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大伊山自古就是一块风水宝地，左有大伊山，右有大盐河，因称青龙桥。又传桥下有条青龙，因一妇人刷马桶出误而走。古时候大伊山洪水泛滥，每年雨季山洪暴发，海水倒灌，滚滚洪水经弯曲的山前河、护城河流转至此，水流湍急，河口漩涡连连，如花似锦，极其壮观，故名漩桥。又因河床久经洪水冲刷，两岸陡峭形成川口，深丈余，石桥悬于街半空，故又有悬桥之称。自古到今，尽管落桥的人马很多，但从没有伤亡。如此诸论，莫衷一是。

古漩桥原是个繁华之地。夏秋之季，河口两岸舳舻含接，帆樯相望，河口人流如织，渡船来来往往，河堤两岸粮、盐堆集如山，桥北有王发银等五家粮行，有高培举等四家八鲜水果行，有史家全生永等六家杂货店，河口有岱王庙，桥头有天后宫，庙里的咏经声，桥上的车马声，桥下的摇橹声，码头的喧闹声，一片昌盛气象，恍如入汴京之地。

随着岁月推移，川流改道，1957 年小鸭河的开凿，漩桥淤废，弥足珍贵的是眼下尚余六块作古的长石卧于南街中心。

马奶桥，旧址位于镇北护城河上，为五孔石桥。金跳，位于西护城河上，为三孔石桥。任小桥，位于城东古沟，为两孔石桥。烧香桥，旧址位于伊山中学门南，为三孔石桥。黄桥，位于天齐庙下大堰路上。月牙桥，旧址位于同兴巷西，为单孔石桥。土老桥，位于高家山下。三步两桥，位于市残复军人疗养院前，因两条山涧汇合于此，涧沟渠由两块大石板搭建，两桥相隔仅三步而闻名苏鲁。一马上殿桥，位于大寺门前，因桥头有马姓祖坟而得名。

时空转换，岁月流逝，现代交通改变了百年旧貌，常常梦萦于人们心中，人马穿行其间的古桥故不复见，它承载着百年交通的功绩，将永载史册，余恐后无闻，故作收集整理，存为后念。

（灌云县地方志办公室　供稿）

责任编辑　邱仕明

1953 年翻建的大伊山西门大石桥

中共一大研究若干热点问题简述

郑国伟

中共一大会址——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

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的中共“一大”,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中共“一大”理所当然地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重点。这里,对近年来学界关于“一大”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作一简述。

中共“一大”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召开的吗?

对于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筹备问题,以往学术界根据董必武、李达等“一大”代表的回忆认为,马林来华之前国内没有召开“一大”的动议和筹备活动,所以“一大”的召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有关。还有学者提出,尼克尔斯基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具体发起建议者。针对以上说法,最近有学者予以了否定,并认为中共“一大”的发起者不可能是尼克尔斯基,中共“一大”是自行筹备召开的。虽然在名义上马林协助尼克尔斯基完成远东书记处的工作,但在全局性的工作中,马林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另外从两人的经历来看,马林赴华时已经拥有了在东

方殖民地工作的丰富经验了，这一点远非尼克尔斯基所能比。所以不难理解马林在实际工作中对中共的早期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尼克尔斯基来华身份与中共“一大”的召开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所以，中共“一大”的召开，既不是马林的建议，更不是尼克尔斯基建议召开的。

中共“一大”的开幕仪式是在哪里举行的?

党的“一大”会议召开的主要地点是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 (今兴业路 76 号) 的李书城(李汉俊哥哥)家里，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嘉兴南湖召开，这些在学术界本来已是共识，没有异议。但是，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博文女校也是“一大”的会址之一。他们的依据是：陈潭秋在 1936 年《共产国际》上著文：“7 月底大会开幕了……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张国焘也有类似的回忆：“我们交流意见的结果，决定 7 月 1 日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租用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的课堂。”这些都说明了“一大”开幕于博文女校。另外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中记载推出：中共“一大”第一次会议(开幕会)和第二次会议都在博文女校召开，分别是 7 月 23 日和 7 月 24 日，之后休会起草文件占用两天，第五天才转到李汉俊哥哥家继续开会。不过，这一观点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包惠僧究竟是不是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

史学界对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一直有争论，主要是 12 人说和 13 人说，以往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资格上。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争论一直比较多，有“正式代表”和“非正式代表”两种主要说法。“正式代表”说中又分为三种：一是“湖北代表”说，这种说法主要见之“一大”代表张国焘的回忆，在学术界持这一说法的基本没有。二是“广东代表”说，在“一大”代表中，周佛海、陈潭秋、董必武及包惠僧本人都持这一说法，在学术界支持这一说法的也比较多。三是“陈独秀指定的代表”说。

“非正式代表”说则有两种说法：一是“串门子”说，出自“一大”代表刘仁静的说法；二是“观察员”说，此说最早出自日本学者小野信尔的《图说中国历史》一书(1977 年版)，在中国学者中也有持该说者。近年来，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观点比较一致，认为包惠僧是中共“一大”广东代表。此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那就是包惠僧是临时中央和陈独秀之间的联络员。有学者认为，包惠僧代表资格争议的原因是没有搞清他的身份，包惠僧不是代表，是陈独秀派往临时中央和向大会组织者汇报说明情况的使者。

党的“一大”的 13 名代表最终有五种结局。一直参与革命并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有两人：毛泽东、董必武。革命斗争中牺牲四人：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被敌人杀害；王尽美病故，也算是烈士。曾经脱党但坚持革命的两人：李达曾经脱党，后来又再度入党；李汉俊曾经脱党，但是解放后回来了。从“一大”代表到脱离革命走向对立面，再到寻找组织、迷途知返的两人：刘仁静和包惠僧，当然他们不能再重新入党了。叛党变成反革命的三人：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而陈公博、周佛海成了汉奸。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这些人都没有想到将来到底会有怎样的结局，这些不同观念的人以一种学术研讨的形式参加了党的建设。1982 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读研时曾访问过当时唯一在世的“一大”代表刘仁静。我问他，为什么您当了“一大”代表? 他说，“当时只是说要开个会，李大钊有事离不开，罗章龙和邓中夏又很忙，就让我和张国焘去了，我根本没想到那是那么重要的一次会。”那时，就像在茫茫黑夜之中，50 多个知识分子，选出 10 多个代表开一个会，将来的前景怎样谁能想到?那时他们确实没有感到他们从事的将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事业。

何叔衡有没有出席中共“一大”?

何叔衡是中共湖南早期组织选出的中共“一大”代表，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何叔衡有没有出席“一大”? 这是有一定探讨余地的问题。提出这一说法的最早是“一大”代表张国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学者认同这一说法。但是由于特殊的原因，这一说法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反响，在一些有关中共“一大”研究综述的文章中甚至都没有提及

这种观点。进入新世纪后，又有学者根据陈公博1924年回忆、党的“六大”上绘制的“一大”代表名单、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复信、《毛泽东自述》、《谢觉哉的日记》以及其他“一大”代表的回忆等十几个方面的材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考证，结论是：何叔衡是“一大”代表，但未出席“一大”。

中共“一大”产生的中央机构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对于这一选举产生的机构情况，长期以来党史界根据传统说法认为，由于当时党员数量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会议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全面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一些党史著作基本上也都秉承此种说法。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认为中共“一大”选出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后成立“中央局”。还有学者认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人员均为三人。主要根据是：其一，“一大”党纲与决议的规定。其二，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其三，1921年10月13日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斯基的通信称代表大会在结束时选出了由四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委员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总部主任就是其中之一。

怎样看待参加中共“一大”的两位共产国际代表的作用和身份？

在中共“一大”的参加者中，有两位外国人，即俄国人、共产国际使者尼克尔斯基和荷兰人、曾担任过列宁工作秘书而由列宁推荐来华的共产国际正式驻华代表马林。

长期以来，研究者往往强调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依据主要来自“一大”代表事后的追忆。包惠僧回忆：“中共‘一大’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他到上海之后与李汉俊、张国焘等人商定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会议”。近年有学者撰文客观评价了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认为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并不像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的那么大：“他到上海后，配合尼克尔斯基工作，参与了‘一大’会议的筹备工作，部分地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会议，并及时识破了闯入会议室的租界暗探的身份，使这次会议得以继续异地举行。会议期间，马林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但主要观点并未被多数代表接受”。

而对参加中共“一大”的另外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在“一大”期间的作用如何？研究者一直不是很清楚。“一大”代表包惠僧认为尼克尔斯基的身份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而张国焘则认为尼克尔斯基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很多党史专著、教科书或者干脆不提尼克尔斯基这个人，或者提及也只是承袭包惠僧或张国焘的说法，而关于尼克尔斯基的其他情况则一无所知。

不仅我国学界对尼克尔斯基的情况知之不详，即便是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对尼克尔斯基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根本原因就是缺少此人的档案材料。

近年来，关于尼克尔斯基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俄罗斯和蒙古学者查到了尼克尔斯基的档案，终于将尼克尔斯基的身份给搞清楚了。原来尼克尔斯基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到中国去的，在尼克尔斯基去中国时担负的任务主要有这么几项：(1)同马林一起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筹备和举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2)担负职工国际(更确切地说，是在赤塔设有分会的国际工会联合会)代表的职责；(3)负责向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以及当时在这个国家工作的其他苏俄共产党人提供经费。尼克尔斯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苏俄情报人员。另外，尼克尔斯基照片同时也被发现，弥补了长期以来所有历史书籍和陈列展览中，中共“一大”15位参加者照片不全的缺憾。

责任编辑　邱仕明